



总第63期 2017年3月出版

准印证号

京内资准字2006-L0013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主办单位：北京市西城区档案局（馆）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68号

邮政编码：100054

联系电话：（010）83976501

（010）83976494

E-mail: Xczy8806@126.com

编委会

主编：李茂福

副主编：金梅 汪杰 杨真

编辑：张小丽 符欣 江成

庞晨

摄影：陈淑运

题字：爱新觉罗·溥任

封面：烟袋斜街东口（1955年）

封底：烟袋斜街（曲扬摄）

敬告各界读者

●本刊不退稿，请自留底稿。

●作者来稿必须是著作权人或依法享有发表权的公民，如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均与本刊无关，由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并对由此给本刊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本刊已纳入《北京西城往事》、北京西城档案信息网。凡《西城追忆》发表的文章在以上书籍、网站采用，不再重复支付稿费。如对此持有异议，来稿时请事先说明。

目录 Contents

兰台动态

- 01 司马红到西城区档案局(馆)调研
- 02 西城区档案局迅速开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
- 02 西城区档案局召开全体会部署全年工作

档案记忆西城

- 03 浅谈建国初期的城市人口疏解 庞晨
- 07 北京历代帝王庙档案背后的故事 郝欣

口述纪实

- 10 我在中国大学的革命经历 姜千里
- 13 我的父亲魏国元和他的兄弟们 魏云平

专稿——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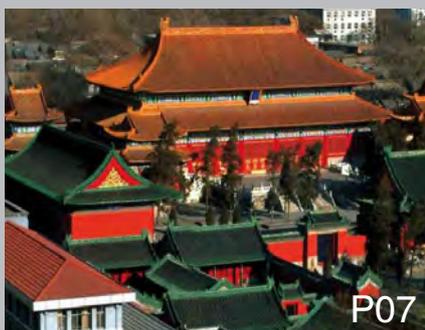
- 19 人民抗日在宣南 王克昌
- 24 杨子健——宣南隐蔽战线的抗战英雄 范苑
- 26 一位档案人的历史档案 韩春鸣

西城文萃

- 30 论北京胡同的区域特色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朱祖希
- 34 藕芽胡同7号老宅院的砖雕、木雕艺术 李明德

西城追忆

爱新觉罗溥任



P07



P28



P54

往事追踪

- 35 铁肩担道义 信仰铸党魂——革命先驱李大钊就义前后 孙良菊
41 我家四代人的启蒙母校马相胡同小学 王建民
45 翟鸿起周年祭 高巍

西城随笔

- 48 风雨二百载 酱菜誉京城 张宝堃
51 中轴线的记忆 薛仲迪

西城旧景

- 54 李大钊在西城石驸马后宅的岁月 康广云
57 松坡图书馆——梁蔡师生情谊的见证 袁泉 梁思萃

司马红到区档案局（馆）调研 充分肯定西城档案事业取得的成绩

1月24日上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司马红到区档案局（馆）调研。她参观了区档案馆一层大厅“舒了先生胡同档案陈列展”、二层档案阅览大厅、陈列室和声像、文书档案库房，听取了西城区档案局（馆）长李茂福关于全区档案工作汇报。司马红同志对西城区档案局近年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开拓档案事业发展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她强调：档案工作是非紧急工作，但又是特别重要的工作，看似简单却专业性很强，它发挥着记载历史、传承文明、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的作用。因此，档案工作者要富有责任心，敢于担当，进一步加强基层档案工作。她强调：第一，在档案资源方面，除了数量上更为丰富，要在质量上，从源头把关，对基层多加指导培训。对重大项目、重大活动、国有企业档案、机构调整，档案管理要及时跟进，主动服务。第二，在服务提升方面，扩大影响力，加强档案对民生、大局决策方面提供决策参考的力度，充分体现服务水平、服务能力、服务效力。第三，随着信息化提速，在保障档案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如何借用新技术手段提升档案管理利用水平，要进行深入调研，并在实际工作中高效运用。第四，加强安全体系建设，今年首要任务是新馆建设开工，要保障档案保存安全、信息安全、政治安全。第五，要加强干部队伍培养，廉政建设要时刻提醒，切实强化勤政建设、严格自律、增强责任心。



司马红（左二）参观“舒了先生胡同档案陈列展”



司马红（右二）在西城区档案局（馆）库房检查档案的保管情况

西城区档案局迅速开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

2月27日，区档案局召开局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迅速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月23日下午至24日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局党组书记、局长李茂福主持会议，局党组全体成员、局（馆）副科长以上干部全体参加。

会上，局党组书记、局长李茂福通报了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视察的有关情况，传达了习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市委书记郭金龙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以及区委书记卢映川在西城区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的三点要求。

大家一致认为，时隔三年，习总书记再次视察北京并发表重要讲话，体现了总书记对北京工作的关心关怀、对首都发展的感情和厚望。讲话围绕提高城市治理能力、抓好城市规划建设，深刻阐释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问题，对城市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把习总书记的巨大关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将档案工作融入我市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总目标之中，主动投身于首都核心区科学治理的生动实践之中。

结合档案局实际，李茂福提出三点要求。第一，要及时传达学习。要求会后各科室立即召开科务会，把习总书记的最新指示和最新要求，传达到每一名党员、每一名干部。第二，要深入思考领会。把学习习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纳入局机关“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领导班子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讲话精神的核心要义。第三，要迅速贯彻落实。要结合档案馆新馆建设、重点工程建设档案业务指导、档案局（馆）“折子工程”等工作，深入思考和探索服务领导决策、服务城市建设，为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提高城市功能、文化和管理等品质，切实加强档案服务水平和能力。

西城区档案局召开全体会部署全年工作

2017年3月13日，西城区档案局召开第一次全体会，会议传达了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精神，部署了西城区档案局2017年工作。会上，局领导班子与分管科室负责人签订了《2017年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通过逐级签订责任书的形式，强化各级领导班子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责任。李茂福局长对全体人员提出以下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服务首都发展大局。改革发展任务对档案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不断强化首都意识，让档案工作为改革发展服好务。二是强化责任担当，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完成。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折子工程的落实，做到层层传导，人人有责，持续发力，人尽其责。三是培育工匠精神，争当业务能手。业务工作上要追求精益求精，敢为能为，在全局形成学业务、抓业务、比业务的良好氛围，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工作劲头，投入新一年的档案工作。



浅谈建国初期的城市人口疏解

□ 庞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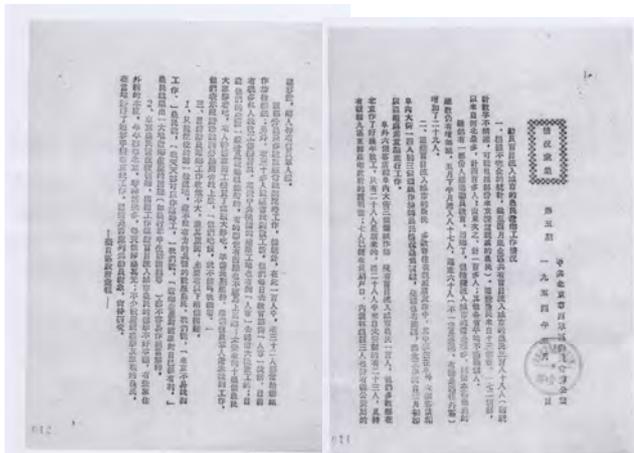
2017年2月26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并发表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讲话三周年。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的视察讲话，明确了北京的城市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部署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指明了北京的发展方向，并提出要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有效控制人口规模，增强区域人口均衡分布，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三年来，西城区在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讲话精神，开展疏解非首都功能工作中走在全市前列。转型升级以“动批”为代表的区域性批发市场47.3万平方米，重拳出击拆除违法建筑32.4万平方米、治理“开墙打洞”2000余户，区域内常住人口总量呈逐年下降趋势，确保“十三五”时期全区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10.7万人以内。

从历史的角度剖析，人口过快增长是产生“大城市病”的重要根源之一。根据档案记载，建国初期的北京曾因为城市人口过快增长，给城市管理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为此中央曾出台过多项措施来疏解城市人口。

上世纪50年代初，动员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还乡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困难重重，直到1953年我国才真正迎来了大规模的国家建设。为响应国家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号召，当年制定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中强调要把北京建设成为以重工业为主的现代化工业基地。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为解决当时北京基本建设劳动力短缺现象，有计划地从外省农村招收农民工，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矛盾。

但随着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来京务工的农民数量也相应迅猛增长。根据西城区档案馆的档案记



图一：动员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还乡工作情况

载（图一），1954年西单区曾抽调公安、劳动、民政部门的干部对这些来京务工农民作了深入调查，发现他们的籍贯主要以河北省居多、山东省次之。这些人中有一部分寄住在亲戚朋友家中，有一部分集中居住在阜外大街附近的客店内。他们来京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对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认识不足，盲目来京找工作。一些农民听说首都建设任务大，用人多，工作好找。有些农村青年向往首都，愿意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有些是羡慕城市生活，认为挣钱容易，工作轻松，嫌农村苦没前途。但他们绝大部分是私自来的，只有一小部分人拿了村、乡政府的介绍信。二是有些单位私自向农村招工，造成大批农民盲目进京找工作。随着首都建设步伐的加快，很多建设项目面临任务重劳动力不能满足的情况。“人市”作为当时社会上自发形成的劳动力市场，聚集劳动力少则数十人，多则上千人。于是一些用人单位常常未报计划或未经批准，私自到农村或“人市”上招工，造成了用工混乱的现象，助长了农民流入城市的无序状态。

盲目流入北京的农民严重影响了城市的社会治

安和秩序。他们绝大部分白天背着行李在大街上乱转，有的到“人市”做短工，有的做小贩，寻求生路。夜晚没有固定住所的人只能在城门洞、车站，甚至旷野中露宿。还有的人因给不起店钱，卖掉了铺盖或赊欠店钱。露宿街头的农民有的成群结伙向当地居民借钱，随随便便、偷窃诈骗、抢东西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针对这些问题，中央连续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农民自由进城的政令。1953年4月17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7年3月2日国务院又发布《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9月14日再次发布《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北京市于1953年4月20日成立了动员农民还乡办公室，并在各区县成立工作组，抽调公安、劳动、民政部门的干部临时参加动员工作。一是对盲目来京农民大力开展收容、动员、遣送返乡工作。按照中央“城市遣送，农村安置，生活困难适当补助路费”的方针，工作组的干部们先做好来京农民的思想工作，通过说服教育，解除思想顾虑，动员他们返乡，对其中生活有困难的农民免费提供食宿，补贴返乡车费。二是规范招工制度，禁止各单位私招盲目来京农民。为了制止一些单位私自招工，北京市逐步规范招用工制度。1955年3月北京市劳动局颁发《北京市建筑单位招用外地工人暂行规定》。1956年3月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劳动力管理和供应工作的几项规定》，明确劳动力统一管理的方针，要求市属企、事业单位招用新工人必须提出计划，由主管部门批准；凡需要从外地招工时，必须经劳动局转报劳动部批准。通过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对私招工人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使各单位私招乱雇现象大大减少了。三是取缔“人市”，堵塞私招渠道。据档案记载，《宣武区关于盲目流入城市农民情况的调查报告》（图二）中曾多次提到“人市”与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和单位私自招工有着密切联系，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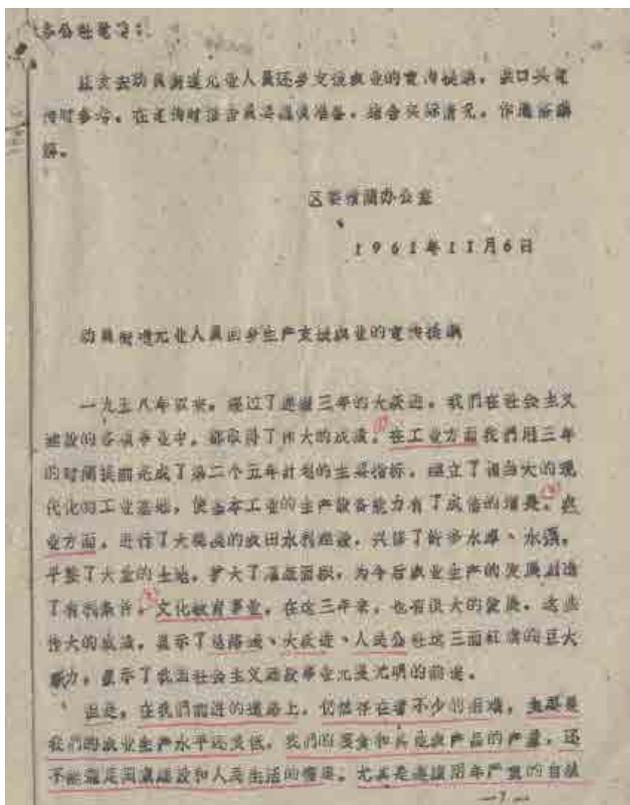
图二：宣武区人民政府关于盲目流入城市农民情况的调查报告

此当时区里每天派干部去“人市”进行政策宣传教育，动员市场中的外地农民返乡，对市场上私自招工的单位进行检查处理。此番工作几经周折，直到1959年9月7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批转市劳动局《关于继续取缔“人市”的报告》，明令坚决取缔，从而基本取消了“人市”。

上世纪60年代初，精简城市人口工作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带动了新的一批劳动力投入到首都建设中来。这一时期，北京市人口的净迁入量与净迁入率，超过了“一五”计划时期的一倍以上，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人口规模增长的最高峰时期。随后又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农业减产，农民的粮食产量不足以供应日渐庞大的城市人口，部分农村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城镇居民也因饥饿而出现了浮肿病，为此党中央不得不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的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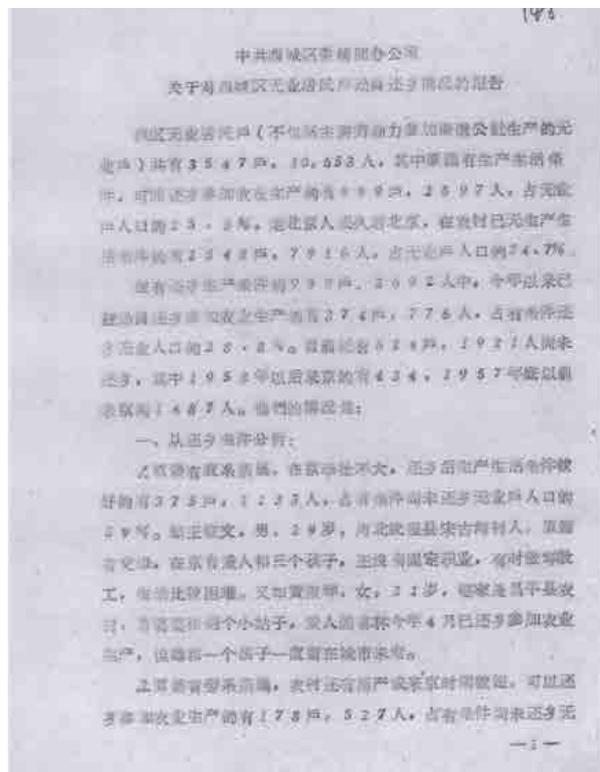
1961年1月，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九中全会，全会公报中明确指出：“1961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至此，对中



图三：动员街道无业人员回乡生产支援农业的宣传提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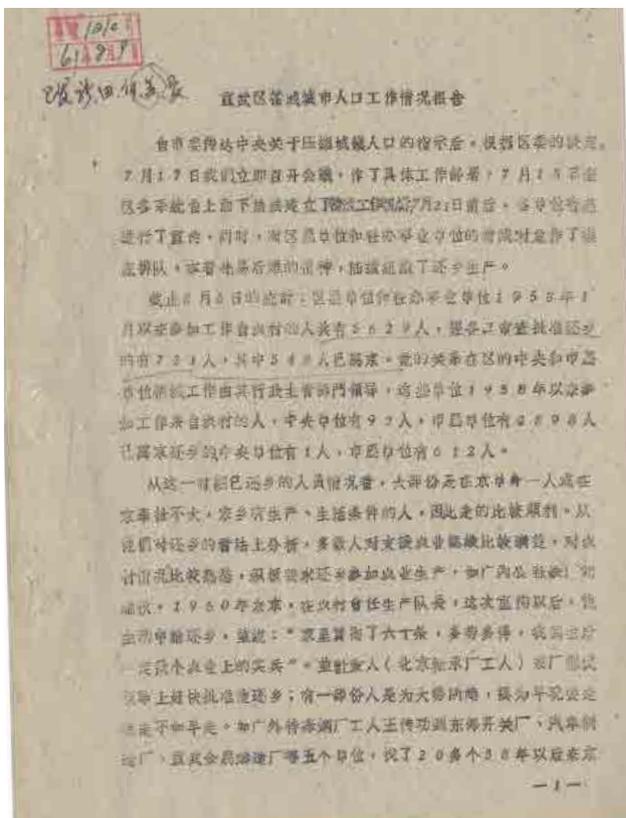
国经济克服严重困难，纠正大跃进错误起了巨大作用的“八字方针”就出台了。5月31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指出：“三年来，我们招收城市职工二千五百多万人，使城市人口增加到一亿三千万，现在看来，并不恰当。”原因在于“粮食并不够，工业摊子铺得太大，用人又太多，人浮于事”，他认为这样下去是不行的。6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精简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于是清理城市农村劳动力、精简职工的工作正式启动。

同年，北京市正式开始了人口精简工作。各个区县开始成立精简城市人口工作办公室，在全市上下掀起了动员城市人口回乡的高潮。首先是从思想上开始抓，根据档案记载（图三），当时原宣武区精简办公室发布的动员街道无业人员回乡生产支援农业的宣传提纲上就提到：“城市人口回乡生产，不仅可以解决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且也可以



图四：中共西城区委精简办公室关于对西城区无业居民户动员还乡情况的报告

减轻农村对城市的供应……这是支援农业、发展农业的最实际、最有效的好办法。”其次，对城市内划为精简人员的情况做到了细致的调查研究。根据1962年一份原西城区委精简办公室所作的《关于对西城区无业居民户动员还乡情况的报告》（图四）中记载，当时西城区内无业居民有10653人，近3成左右是原籍有生活条件，可以还乡生产。其中通过动员已有776人还乡，还有1921人尚未还乡。这些人经过多次动员，但仍未还乡，原因大致分为几类：一是在北京有临时性工作，不愿还乡。二是与原籍亲属关系不好不还乡的。三是留恋城市生活，怕在农村受苦的。四是强调自身有病，需要在北京医治的。五是过去有政治问题，碍于面子怕还乡抬不起头的。最后，各区工作组本着先易后难的精神，陆续组织精简对象还乡生产。据《宣武区精减城市人口工作情况报告》（图五）记载，当时区里组织精简对象还乡工作是分以下几个步骤进行的：



图五：宣武区精简城市人口工作情况报告

一是贯彻先易后难的精神，对还乡生产的精简对象分类排队。当时各单位对还乡对象以在京有无牵扯、还乡后有没有生产和生活条件、对还乡的认识及态度这三方面为依据加以分类排队。二是搞通思想，切实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据调查，在还乡人员中有少数人因为涉及在京已成家或正在谈婚论嫁中，对还乡有思想顾虑。于是，各单位除通过对这类人员进行深入思想动员外还给予他们安排探亲假等措施，使他们的还乡问题得到解决。三是热情欢送，做好还乡前的各项组织工作。各单位在还乡人员临走前都会组织召开欢送会，给他们拆洗被褥、帮助办理各项手续、购买火车票、运送行李并直接派人送到车站，给还乡人员提供一切便利。据档案记载，截至到1961年8月6日，原宣武区属单位和社办事业单位从1958年1月以来参加工作来自农村的共有5629人，经各口审查批准还乡的有721人，

其中548人已离京。

随着精简工作的深入推进，当时北京市由此净迁出人口大幅度上升和农业人口转非农业人口出现大量负值。到1962年9月，全国共减少职工940多万人，城镇人口由上半年的12707万人减为11659万人，净减1048万人。1963年3月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1963年再精减职工160万人，减少城市人口800万人。在党的号召下，这一工作迅速完成。7月31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精简小组作出的《关于精减任务完成情况和胜利结束精减工作的意见的报告》，决定基本结束精简职工工作。报告中指出：由于大量地减少了职工、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加强了农业战线，减少了工资开支，减少了粮食销量，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精简工作结束时，毛主席赞扬道：“我们的中国人民、我们的广大干部，好呀！叫作两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党能办到？！”

回顾建国初期的城市人口疏解，对当前北京大力开展的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调控人口工作仍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今年2月23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年前的北京考察进行回访。他明确指出，北京的城市规划建设一定要让人口资源环境同城市战略定位相协调，城市布局同城市战略定位相一致。习总书记的两次北京视察，深刻阐释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问题。相信广大党员干部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坚定信心、脚踏实地，一张蓝图绘到底，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定能不断开创首都改革发展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北京历代帝王庙档案背后的故事

□ 郝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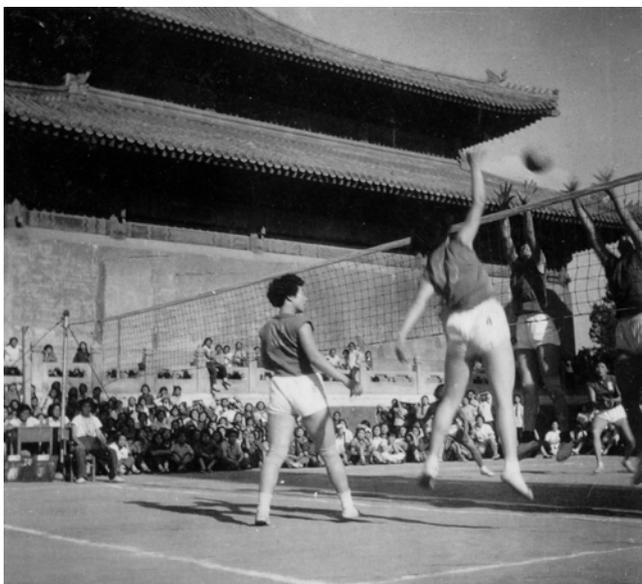
今年是北京历代帝王庙修缮后对外开放的第十三年，我作为历代帝王庙管理处的档案管理人员，欲将声像档案资料进行全部备份和整理，做好档案的基础工作。当我翻开了北京历代帝王庙声像档案时，我不自觉地又打开了那份一直印在我心中声像档案，它留给我深刻的印象，希望将这一珍贵的档案保存好。

我是2004年调到修葺一新的历代帝王庙工作的，那时它即将重新对外开放。之所以记忆犹新，是因为通过这份珍贵的声像档案，使我了解到历代帝王庙以往的一段历史。这是一件1993年留存的声像档案，记录的是1993年时历代帝王庙庙内的使用和文物建筑的真实状况。在那时历代帝王庙还是北京市第一五九中学的校舍。档案中记载下那么多的师生们在这个古朴的庙宇中学习、生活的资料。我一边看一边为那些师生感到自豪和幸福。他们每天都能耳濡目染地亲身体会中国传统文化，并被中国皇家古代建筑元素所包围。在这样古香古色的校园中学习古代的经典，一定会感受颇深的，甚至可以穿越历史，一定能激发他们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求知欲望。

北京历代帝王庙，建于明朝嘉靖九年（1530），是明、清两朝皇帝祭祀历代帝王和历代名臣的现存的一座皇家庙宇。（图一）庙内建有景德门、景德崇圣殿、东西配殿、御碑亭、神厨、神库、宰牲亭、关帝庙等明、清时期的建筑，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科学艺术价值以及现实社会价值。民国中期以后，这里先后被用作学校的校舍，先后是北平幼稚师范学校、北京市立第三女子中学等学校（图二）。1972年后，这里的学校被统编为北京第一五九中学（图三）。在这里，一代一代的教育工作者培育出很多的优秀人才，早已是桃李满天下。



图一：修缮后的历代帝王庙全景



图二：当时在庙内办学的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学生们正在举办排球比赛

在档案中，记录了学生们在校内学习知识、锻炼身体、升国旗（图三）、开展体育比赛等画面，留下他们的青春身影和欢乐笑语。我在不禁感叹和羡慕的同时，也了解到了当时的历代帝王庙的建筑情况，屋顶杂草丛生、木结构严重糟朽、变形，墙体松散等，感到办学环境是那么艰苦。据了解，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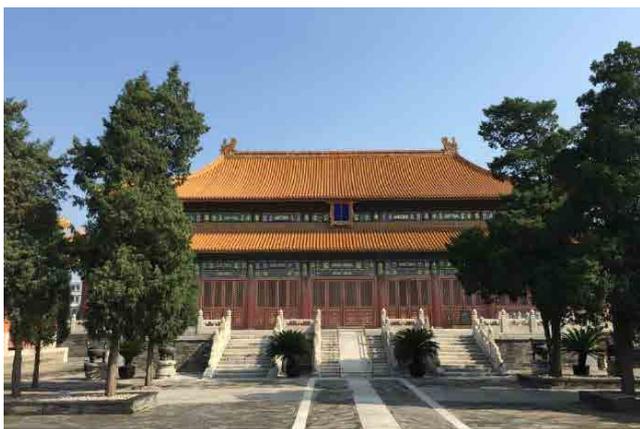
图三：一五九中学的师生在历代帝王庙的景德崇圣殿前行升旗仪式

第一五九中学办学期间，对文物建筑保护一直极为重视，为保护历代帝王庙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学校和上级主管部门经常筹措资金和申请拨款对历代帝王庙进行排险抢修，但文物建筑的状况仍然令人担忧。一些曾经在学校工作过的老师叙述，当时在历代帝王庙的主体建筑——景德崇圣殿的屋顶和房檐下长有28棵树，还不包括一些小树，其他的建筑也存在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安全隐患。这件档案也真实地记录了历代帝王庙在1993年的真实状况。

在中国加入WTO和北京申奥成功后，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增强，文物事业迅速发展，北京市政府连续三年每年拿出1.1亿，对北京市重点文物进行修缮。2000年12月，在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部门、西城区政府等各方的努力下，按照“忠实历史、恢复原貌”的原则，搬迁了原来在历代帝王庙中办学的北京第159中学，另外选址建造了新的现代化的校舍，并对历代帝王庙进行了大规模的文物修缮。北京历代帝王庙修缮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各级部门、文物界的有关专家、学者和西城区文物工作者们以及文物古建修缮施工的能工巧匠们为历代帝王庙的修缮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那么多的艰辛。为了准确地展现历代帝王庙的历史原貌，经过严格的专家论证、现场勘测，查找大量的史料和历史档案，还向社会发布了征集历代帝王庙原始资料及实物或照片档案。经中国文物研究所帮助，找



图四：1931年拍摄的景德崇圣殿外景



图五：修缮后景德崇圣殿外景



图六：修缮后的景德崇圣殿内景

到了1931年北平研究所以常惠先生为首的北京内城寺庙调查组拍摄的20余张历代帝王庙照片，30余张1953年维修时老照片，还有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后在历代帝王庙祭祀活动的老照片。（图四）（图五）这些征集的照片档案和查找、留存的一些历史档案，为历代帝王庙的修缮和复建工作提供了一些依据。例如，景德崇圣殿内的祭祀陈设在这之



图七：1925年拍摄的景德崇圣殿内景

前已经全部被拆除，需要对景德崇圣殿内的陈设——神龛、牌位、楹联等文物进行复原的工作中起到了借鉴的作用。（图六、七）在对祭器库、燎炉、香炉等文物建筑进行复建时，一些照片档案和声像档案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在“保护为主”的前提下，历代帝王庙修缮了景德崇圣殿、东西配殿、碑亭等建筑，复建了庙内的关帝庙、祭器库等建筑。在修缮中注重也对有价值的信息进行了记载，通过拍摄、录像及其他高科技手段，留存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档案资料。每一份珍贵的档案背后都有一些生动感人的故事，我给大家讲述的只是其中之一，可以说档案的收集、整理、应用也始终贯穿于历代帝王庙的文物保护各项工作之中。

通过修缮和复建，恢复了这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原貌，最好地保护了文物，使历代帝王庙成为北京又一个人文亮点，这一精美绝伦的古建精品建筑再一次呈现在世人面前。2004年4月修缮后历代帝王庙重新对社会开放，2007年经北京市文物局批准成立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隶属于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占地21106平方米，展厅面积约6000平方米，现已累计接待游客和参观团体将近30万人次。历代帝王庙每年通过举办活动、展览、开展研究等，较好地发挥了博物馆职能和西城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图八至图十）

修缮后的历代帝王庙内虽然再也听不见了学生们琅琅的读书声，但它为更多的人提供学习、休闲、交流的机会，更加凸显了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每当我在庙内踱步或带着游客、中学生、前来访问团体参观历代帝王庙，向他们介绍历代帝王庙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以及建筑特色时，我欣慰地看着眼前金碧辉煌、巍峨庄严的建筑群，又不禁想起那些档案中的画面，同时体味着档案背后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图八：历代帝王庙举办的《相聚历代帝王庙 拜谒三皇五帝》活动



图九：在庙内举办的群众文化活动



图十：社会各界人士参观《功在社稷德协股肱——历代帝王庙从祀名臣展》

我在中国大学的革命经历

□ 姜千里

口述者简介：

姜千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1925年生人，祖籍山东，1944年考入中国大学哲教系。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1949年解放后曾先后在北京市委组织部、西四区（西城区）委组织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机关文化组等部门任职。

谈起我在中国大学里开展党的革命工作之前，首先要阐明一下我的组织关系。我是从山东考入到中国大学来，最开始是受山东地下党组织的领导，跟北平地下党还没建立关系。后来怎么就发生了关系呢？这里有个故事。当时，从日本投降到国共谈判时期，整个社会人民的情绪都非常高涨，政治气氛也是异常活跃。但那时中国大学里面还没有党支部，在那样的一个政治气氛下，中大里的各个社团搞的讲演活动非常多。北平地下党利用这个时机，派人到中国大学里面参加活动。我亲眼见过有两个人就不是中大的学生，他们是西单邮局的弟兄俩，都是北平地下党的，他们老去。那时候我在学校里面也经常参加社团活动，办墙报、搞讲演什么的，后来就与他们认识了。之后这俩人老找我，就这样通过各种活动相互熟识、了解了。突然就有一天他们跟我说想发展我入党，让我加入北平地下党。由于跟这两个人都很了解，我就笑着对他们说：“你甭发展了，我是山东的地下党”。这两个人听完一惊，就跟我说要请示一下他们的组织。于是他们请示完了又找我，说组织跟他们说让我能不能再加入一次北平的地下党，说是这样我就可以受北平的党组织领导了。我听完赶紧又跟山东的党组织请示了一番，山东那边也同意了。这样，我就又加入一次北平的地下党，算是与北平的党组织建立起联系。

从与北平地下党建立联系开始，我被安排在校外的支部，这个支部受北平地下党学委的领导。加入这个支部后他们给我分配了一个任务，干吗呢？让我去探路。

探什么路呢？当时中共华北局有个城工部，在刘仁同志



姜千里

已经迁到了泊镇，就是河北省的那个泊镇。那时泊镇已经解放了，属于解放区，因此城工部都迁到那里去了。迁到泊镇后，北平地下党和泊镇解放区的人员往来需要保障安全。涉及到交通路线问题，哪条路能走，哪条路不能走，都需要有人去探一下路。于是他们派给我这个任务，我也痛快地就接受了。

那时从北平到天津是通火车的，从天津再往南就不通了，这一路又经过敌占区，又经过解放区的，道路特别复杂。我就先到了天津，到了后找我的一个山东老乡，通过他的关系知道在泊镇还有我另外一个老乡，然后我就继续出发从天津南下到泊镇。我一出天津往南走，就发现还有一段路仍属于国民党的占领区，只有过了这里才算是真正进入解放区。我在路上慢慢地走，并琢磨怎么能顺利地走出去，这时正好有一辆大车，那时候是马鞍大车。上面坐着个老太太，怀里还抱着个小孩，我一看这是个条件，于是跟她们说了说，就钻进车子里，也没被盘查，就跟着这辆大车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占领区，平安到达了泊镇。到了泊镇我先到城工部去，向他们汇报我探路这个任务。晚上住在泊镇那

个山东老乡的家里，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从泊镇赶回了北平，向组织汇报这个路线可以走，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这是我在校外工作中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

我和中国大学党支部正式建立起联系是在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时期，当时国民党在城市里面搞大逮捕，中大的党支部也遭到血腥镇压，有的党员被捕，有的党员身份暴露撤出了，所以那时中大支部里的党员没剩下几个人。这时就需要去充实支部的力量，把外面的党员调进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北平地下党组织就把我的关系转到了中大支部，于是我才跟中大支部建立起关系来。后来我就参加支部的领导工作，再后来就接任了支部书记。但我接任的时候，中大的支部已经没剩多少人了。接任书记以后，当时的战局形势已经向共产党这边靠拢了，三大战役全面打响，对于我们的任务就是做好迎接解放的准备。我接任支部书记后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团结各方力量。迎接解放就得想办法把解放军、共产党员接进城来，但光靠当时学校里的党员力量还远远不够，所以就要通过党员做群众工作，团结同学、广交朋友。那时动员群众，不但要联系进步的同学，还要联系中间的、落后的同学。那时中国大学一共三个学院，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其中又包括了11个系，1000多个学生，每个系都有自己的学会。当时除了团结群众以外，还要发动党员、进步同学去加强学会的工作，参加各个学会的活动，通过学会去团结更多的人。

二是宣传解放区政策。在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的败局已经显现了。所以我们党就要经常向群众传达战争形势的情况，宣传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到1949年平津战役时，党组织通过地下党向北平发出了通告，这个通告就是宣传党的城市政策。那些材料都通过秘密渠道印制，因为我们有地下印刷厂。这些材料印刷后就分发到了各个支部，我们开始着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向社会散发通告。

三是发展民联成员。当时我们发展了一批民主青年联盟成员，也就是党的外围组织。它是共青团

的前身，解放以后就转成团了，解放以前叫民主青年联盟，这个当时都是秘密的，不对外公开的。民主青年联盟成员发展以后一下就让我们的革命力量增多了，到后来也从中发展不少党员，党员的力量也不像当初那么少了。

四是了解解放军进城探路。那时内战打到后期，咱们解放军不是已经对北平围城了吗？围城后咱们党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方面是跟傅作义谈判，一方面是准备武装进攻。当时我们分析这两种可能，一种是假如傅作义起义了，和平解放北平就没问题了。一种是他不起义，咱也不能总等他啊，那就得武力解放。武力解放势必就要进城打巷战。当时我们的任务就是做好协助解放军武装进城打巷战的准备。分配到各个党员、民联还有进步群众的工作任务就是了解国民党城内驻军的情况。要探探他们都驻扎在哪里？多少人？另外国民党那个时候已经在城内修碉堡了，连街上也修了，在好多路口都有。我们就要了解这些碉堡的位置和情况。了解以后干吗呢？准备一旦咱们解放军攻进来，就给他们带路做引导。这个工作很重要，你不引路，他攻进来就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会造成重大的伤亡。当时给我们中大支部还划了片儿，就是管学校所在的西单周围。大致范围是从西四以南到宣武门城门以北，因为西单这片儿是归中大支部管，所以起码你得对这一片儿有所保障，然后我们就去做了一番调查。后来傅作义起义，北平也就和平解放了。

北平解放后，我们中大支部的首要任务就是接管中国大学的各项工作。首先，我们成立了院系联合会，这个联合会作为学生的组织，由各院系的学会去领导开展工作。同时，我们还成立了校职工联合会。这两个联合会的主要任务就是从旧政权的统治者手中夺权。在中大刚解放的时候靠着这两个联合会的力量就把整个学校的工作全部接管了，虽然那时候校长还在，但也只是名义上的，实际工作基本上都由党领导了。

接管以后上级给我们安排任务是让我们组织师生庆祝解放。北平解放了，全城的老百姓上上下下都很高兴，当时我们就发动各院系的学生力量在校

内搞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同时在校外也组织群众欢迎解放军进城。还有个工作就是得解决学校师生吃饭的问题。因为那时中大里还有一批住宿的学生，在解放前城内粮食供给十分紧张，解放后，我们支部跟政府取得联系，弄到了救济粮，解决了食堂的供给问题。

到后来还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大学是否再继续开办下去。当时北京市委和解放军的文管会对这个意见还不一致，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就是让中国大学继续办下去；一种意见就是停办。为这个事，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长的周扬同志让我去向他汇报过一次中大的情况，后来支持停办的居多，最终决定停办了。决定下来后，我们就得做善后的处理，这么多教职工和学生怎么安排呢？经过协商，决定把中大的理学院并到山西大学去，就是把整个理学院的师生全迁到山西去。剩下文学院跟法学院怎么安排呢？当时解放军有个南下工作团，为南下开辟新的解放区急需用人，于是我们就号召同学参加南下工作团，所以有一部分学生就跟着解放军南下了。最后这部分师生怎么办呢？那时解放区有两所大学，华北大学和革命大学。他们的校领导都到中大来找我们要过干部和学生，华大需要一些学生到它那里就读，革大想要一些校领导和干部去它那里帮助管理。于是就把剩下这批学生分了一部分到革大、一部分到了华大，至此中国大学的历史就此结束了。

学校没了以后，我就配合市委把中大支部的党员、团员也都分配走了，毕业的都给分配了工作，各奔东西，整个支部就剩我一人。就在这时，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北平刚一解放没多久，山东那边的党组织就派人来找我，让我赶快回山东工作。市委考虑再三决定不让我回山东还是把我留在了北平，后来山东那边的党组织倒也同意了，就这样我就一直留在了北京工作。

说到这儿，我又是怎样跟咱们西城区结缘的呢？要先从我被市委留下来后安排在组织部工作说起。当时市委组织部还没有设立处室，它就分几个科室，我记得其中有一个科室叫学校支部工作科，

还有一个叫工支科，就是管工厂支部工作的科室。我们地下党组织的学委，也就是领导学生工作的地下学委，后来就变成学支科的人，我就留在那里工作。到了1950年5月，市委决定把各个学校的支部管理下放到各区县去，因为那时区委接管的東西太少，不管学校也好，工厂也好，没多少党员，更没几个支部，所以市委决定就把学校支部工作全都移交下去。于是我就分到了第四区也就是后来的西四区工作，我们学支科还有别的同学有分到西单区的、有分到东单区的，反正都分到下边去了。分下去以后，我就安排在西四区委组织部工作。后来你们也知道，就是配合当时形势搞各种运动，比如肃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同时还要搞党建工作。因为那时区里的党员很少，于是就在各个学校、工厂，甚至是私营单位里面搞党建、发展党组织。后来直到1956年我从西四区委调到北京日报社工作，在西城区的这段工作经历才算结束。

虽然过去了很多年，我还是觉得在中国大学的这段学习和革命经历对自己人生成长是很重要的，既给我在革命这条道路上予以历练，也让我更加坚定了一直跟党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这个目标。但后来中国大学停办这件事一直让我觉得惋惜。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学是孙中山等几位革命党人一手创办的，算是历经多年沧桑的一所老校，它的存在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同时它还牵扯到后来跟台湾地区的统战工作，连孙中山的孙女解放后还来过咱们北京，想联合一些原中大的校友一块儿复校，但最后也都不了了之了。而且从中大毕业出来的学生也都是人才济济，解放以后我还联系到一些山东同学。因为当时在中大我们组织了一个山东同学会，主要就是做山东同学的思想工作，发展他们入党。我记得以我作为介绍人发展了一名党员叫陈泽昌，他毕业以后就回到济南，被安排在山东省教育厅工作。其他大部分同学也和他一样，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后来的改革开放中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的父亲魏国元和他的兄弟们

□ 魏云平

北京西部山区的门头沟区青白口村是我的家乡，解放前这里属于河北省宛平县七区公所所在地。村庄坐落在清水河和永定河的交汇处。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父亲魏国元兄弟四人，他为长兄。另有我二叔魏国杰、三叔魏国相、四叔魏国臣。我的父亲和他的兄弟们的足迹和热血留在了平西、平北、冀东以至东北、江南的大地上。特别是为中共中央“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三位一体的战略任务作出了贡献。

一、七七事变之前的革命活动

1932年，中共地下河北省委在青白口、田庄一带秘密建立党团组织。我父亲魏国元和四叔魏国臣在这年7月同时加入了青年团，第二年转为中共党员。二叔魏国杰、三叔魏国相也于1938年分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中共地下宛平县委正式成立。我父亲相继担任了中共宛平县县委委员、县委副书记职务。并将家中四叔魏国臣和另一个亲戚经营的“双合堂”杂货铺改为“一元春”药铺，作为中共宛平县委的地下机关。我父亲任掌柜。崔显芳（田庄人，中共河北省委保属特委特派员。他在20年代就秘密开展地下工作，是宛平地下党的重要的创始人，据高奉明听马建民说，崔显芳是1924年入的党）任中医。高连勇（苇子水人，中共党员，又名高万章）任学徒。时逢“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战烽火已经燃烧在宛平山区。为了开展武装斗争，中共宛平县委在沿河城的深山中秘密建立了枪支修械所。经上级党组织介绍，将

流亡关内的沈阳兵工厂的技术工人安排在此造枪。并掩护了参加长城抗战的吉鸿昌的骑兵部队经过此地撤退转移。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篇文章中提出了：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积聚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的道路。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军阀之间的矛盾、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分裂和战争，造成白色统治的薄弱环节。同时指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大革命过程中工农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要有很好的群众，很好的党；有相当力量的红军；有便于作战的地势；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等条件。

以宛平县七、八区为中心的斋堂川，是清水河和永定河的部分流域的一条狭长的山川。斋堂古镇是该流域最宽阔的地带，是八区区公所所在地，也是该山地经济文化的中心。早在1928年就发生过李大钊（1927年牺牲，但是他领导的运动仍在山区进行）领导的国共合作在山区开展的国民革命、农民协会运动。农民被大大地发动、宣传、组织过。七、八区进步的知识青年大都参加了这场运动。崔显芳、魏国元、高玉湖（松树地人）等还发动过七区青白口、田庄一带大规模的农民抗捐税斗争。1929年，这场国民革命农民协会运动被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中央镇压下去了。

我的父亲魏国元又陷入了艰苦的探索中。1930年，魏国元考入阎（锡山）系军阀主政河北期间举办的河北省区长训练班。之后被分配到宛平县六区任区长。几个月后，又调到七区任区长。他和崔显芳（魏国元聘请崔显芳担任区长助理）、赵曼卿（原名赵铭鉴，青白口人，父亲聘请赵曼卿担任书记员）一行三人回到青白口。由于乡绅的反对，他们没能上任。从此至1933年，三年多的时间里，国民党宛平县政府没有再派别的区长来。崔显芳自荐做了一段时间的区长。这时，崔显芳有了以办学为掩护，发展建立党组织的考虑。当时的组织纪律是单线领导，不发生横向关系。崔显芳向魏国元说透其地下身份的时间我们无史料可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崔显芳创办高小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父亲在1930年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和互济会。他和崔显芳既是同乡，又是志同道合的忘年交。父亲把自家房产拿出来作为校舍，于1932年春和崔显芳开办了宛平县七区高级小学。吸收各村适龄子弟就学。崔显芳聘请贾汇川（中共河北省委保属特委特派员）刘云志等任教，至暑假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建立了青白口、田庄两个党支部和青年团宛平县委。（上级党组织派陈菲到青白口、田庄一带建立青年团）暑假后，七区高小搬迁至田庄。马建民来校任教（中共河北省委保属特委特派员），继续发展党员的工作。重建田庄党支部。沿河城、黄土贵等也相继建立了党支部、党小组。

短短几年时间，七区的“赤色活动”已成气候，并触及到国民党当局的神经。1934年春，宛平县政府派李复华来任七区区长。他们又引起了李复华的怀疑。（李复华八区东斋堂人。曾经和魏国元同为区长训练班学员。他出于情面，聘请魏国元任区长助理，赵铭鉴任区书记员。上级党

组织批准魏、赵的公开身份，即同意以这种公开身份进行地下活动）1934年夏天，由于一宗意外事件牵连致中共地下宛平县委一些人被捕。被捕的人是赵铭鉴（中共地下宛平县委书记）、高连勇、魏国元（中共地下宛平县委副书记）、崔显芳（因另案被捕）、庞勉（魏国元之妻、少共团员），以及犯事人孔祥宝、赵正旺。

父亲临危不惧，迎难而上，斗智斗勇，力求保全组织。当他得知赵铭鉴、高连勇被逮捕，并且文件已经烧掉的情况下，不但不逃走，反而找到宛平县当局去要人，随即被捕。在狱中，他通过看守传去“宁死堂上不死堂下”的字条坚定同志的革命意志，组织口供，勉励难友经受住敌人的严刑拷打。魏国元和赵铭鉴被押解至平津卫戍司令部军法处，又转送河北省高等法院提起公诉。由于敌人没有抓到任何证据，又由于组织和家人的多方营救，七区三十六村联保，聘请两名律师给予辩护等等，此案化险为夷。1935年，赵铭鉴、高连勇、庞勉获得释放。魏国元被判刑两年半，关押于德胜门河北省第二监狱。崔显芳在狱中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经多方营救，于1935年2月保外就医，出狱后不久病逝。终年47岁。

中共宛平县委虽然一度停止了活动，但是斋堂川却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中共上级党组织策划的通过党组织掌握的武装（吉鸿昌部下三旅旅长、共产党员蒋润吾以“在家里”的组织形式发动贫苦农民、组织武装约三百余人），并借助赵大忠、徐义龙、小白龙（白乙化，暴动时这支队伍未到达）、刘桂堂几股武装力量合力西征，向陕北红军刘志丹靠拢，迎接北上红军抗日，扩大建立根据地。四叔魏国臣参加了武装暴动。1935年底，暴动队伍一举打下了斋堂城，并向西进发。由于魏国元当时在狱中，蒋润吾、宋文明（宛平县八区白虎头村人）将魏国臣、贾兰

波（八区东斋堂人，原名贾立芳）等留下坚持工作。并说如果部队西进后联系不上，就设法与北平监狱里的魏国元取得联系。

西进的部队遇到了山西阎锡山、河南万福麟、河北几方面敌军的围追堵截，终被打散。革命群众遭到大屠杀。游击队骨干王学华（王络沟村人）被警察追杀，牺牲在自家炕头上。参加暴动的王汇川、王明川（沿河口村人）两兄弟被捕。王汇川被判死刑，处决于天桥。王明川被判15年徒刑。

当年北平有个报纸叫《实报》。《实报》登载过两则有关信息。一个是关于王汇川的罪名及在天桥被处决的报道。另一个是魏国元（字光汉）的案子，报称“惯匪魏光汉，勾结共匪，私造军火，包庇烟苗……”四大罪状。

二、七七事变前后的重任担当

1936年7月，我父亲经营救出狱后，中共河北省委（中共北方局）派他回乡恢复宛平县地下党组织，积极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并担任了中共地下宛平县委书记。11月，我父亲送赵铭鉴（原中共宛平县委书记）、四叔魏国臣、贾兰波、崔仲春、曹贵亭、庞某某等10人考入国民党二十九军军事训练团。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魏国臣和赵铭鉴、贾兰波等均参加了抵抗日军的战斗。在部队被打散，向南撤退的过程中，魏国臣、贾兰波回到了宛平家乡，在中共宛平县委的领导下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赵铭鉴随国民党部队南撤，与父亲失去了联系。

8月间，国民党卫立煌部增援南口，在青白口、髫髻山一带与日军激战。我父亲积极组织党团员，发动群众支援国民党部队与日军作战。给部队捐粮、款、出夫出牲口、带路等等。同时保护百姓利益，维持秩序，带领百姓转移、躲避战

火，始终和群众在一起。南口失守以后，卫立煌部队向南撤走。卫立煌部队南撤以后，战场上散落着不少枪支，人们三三两两地上山拣拾散落的枪支物品等。一时间，民团、伙会、联庄大有揭竿而起之势。我父亲适时挺身而出，以宛平县七区区长的公开身份，召集各村村长会议，号召人们拿起武器、组织武装、保卫家乡。并派党团员进步青年到民间收集枪支武器，组织游击队。中共宛平县委委员师永林与师永茂兄弟二人收集枪支，并挖出枪支修械所掩藏的枪支，成立了沿河城游击队。

8月底，宛平七区安家庄人李文彬（有民族大义之乡绅乡贤，无党派人士）招兵买马，组织起了队伍。我父亲派我二叔、四叔及张又新（中共宛平县县委委员，又名王云，雁翅人）、贾兰波、彭城（太子墓村人）等前往安家庄帮助李文彬扩大武装。队伍很快发展到300来人，成立了两个中队、一个特务队。李文彬非常喜欢魏国臣、贾兰波等从二十九军回来的军事人才，任命魏国臣担任第一中队队长。张又新也在第一中队，担任了第一中队指导员。贾兰波先留在大队部，后来接替张玉亮（雁翅村人，后来张玉亮也编入八路军，开赴冀东）担任了第二中队队长。他们在李文彬大队秘密建立了党支部。二叔魏国杰在家时就懂得医术，他参加李文彬大队就负责医务工作，后来担任了医务队队长。（后来，四叔魏国臣在冀东牺牲，二叔魏国杰则随部队从冀东一直坚持到东北。）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确定了红军要向敌人后方挺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毛泽东做出了：红军可出一部于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

为了实施东进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北方局

和八路军总部同时向平西派出领导骨干和先头部队，与中共宛平县委相结合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贵人们纷至踏来，青白口这个小山村迎来了它的历史上的辉煌的时期。

10月份，天气渐凉。活跃在北平城一带抗击日军的国民抗日军（红蓝箍）需要向安全地带转移。国民抗日军地方科科长焦若愚和刘平一行三人前往七区找地下党魏国元接头。焦若愚当时不认识魏国元，当得知刘平认识魏国元时非常高兴。（刘平曾与魏国元关押在德胜门河北省第二监狱的同一个牢房一个月）

他们在田庄见了面。魏国元向焦若愚等介绍了宛平县七、八区的形势。指出国民抗日军进入七区没有问题，进入八区没有把握，但是可以工作。之后国民抗日军开进青白口斋堂川，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的热潮。大约一个月之久，他们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顺利通过了八区斋堂，向涞源八路军主力靠拢。国民抗日军行至宛平县杜家庄时，正遇上中共北方局联络员胡敬一带领的吴伟、赖富等12人的红军队伍。他们由八路军总部朱德派往平西，正在前往青白口。胡敬一经过国民抗日军领导同意，将焦若愚、宋元两人留下，跟他一起返回青白口开展工作。

这一行15人到达青白口一星期之时，北方局刘少奇、彭真派出的苏梅（原任中共东北工作特别委员会书记。后来任八路军四纵政治部副主任）、陈群（原任红四方面军副师长，整编后任八路军115师副团长。后来任八路军四纵三十三大队副大队长。冀热察挺进军十二团团团长，1941年牺牲于冀东）、陈仲三（营级）到达青白口。苏梅持北方局组织部长李大章出具的组织关系介绍信与魏国元接头，并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苏梅他们的组织关系属于中共宛平县委。

1937年11月11日，中共北平市委农委负责人

刘杰、党员干部李光汉、王子展由中共北平市委联络员王恒带路出城，前往青白口村。走到九区醜儿岭，被当地武装郑大麻子（近于土匪性质）扣押。审问中他们说是来找老朋友魏国元做买卖的。郑大麻子不但没有加害他们，反而把信儿透了出去。魏国元得知消息后，立即通过九区进步人士安德珍出面营救，并派党员前往九区将刘杰一行接到青白口。

此事之后，中共宛平县委借此机会对郑大麻子开展工作，争取团结郑大麻子合作抗日。凡是提魏国元名字，或有字条的一律放行。后来，又有20多名从城里撤出的干部是经过九区的郑大麻子的关照来到青白口的。

几方面的干部陆续汇聚一起，继续发展党员和民先队员；以抗日大同盟兄弟盟誓的方法团结各村地方武装；组织抗日救国会；向当地上层人物和各界人士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等等。按照中央的指示，所有汇集在青白口村的各方面的干部全部编入平西抗日游击支队。支队长吴伟、队副陈群、参谋长赖富、党代表胡敬一、后勤部长魏国元。1938年元旦天亮之前，按照聂荣臻司令员的指令，这支80余人的队伍秘密集合，整队前往阜平。

在阜平，聂荣臻分别找干部谈了话。苏梅和魏国元向聂司令员汇报了平西的工作。当聂司令员问道：“现在派主力部队去平西，能不能站住脚？”苏梅和魏国元互相交换了一下目光，异口同声地说：“能站住脚！”“好，就派主力部队开到平西去！”聂荣臻司令员说。

1938年3月，八路军主力邓华支队开到斋堂。在斋堂建立了京郊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父亲担任了县长。父亲将地方武装统编成县大队，称为平西游击自卫支队，并担任了支队长。陈群担任了副支队长。4月，发生

了妄图推翻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赶走八路军邓华支队的大村事变。魏国元派县大队的第九游击队（沿河城游击队）从向阳口后山抄小路赶赴大村，配合邓华部队平息了大村事变。父亲向邓华支队介绍了宛平一带地方武装的情况。邓华支队向李文彬、龚长海两支武装供给军需物资，开始了对地方武装的收编工作。魏国元跟苏梅商量，将陈群、陈仲三派往李文彬大队加强工作。按照魏国元的介绍，陈群前往安家庄找魏国臣联系。魏国臣带着陈群去见李文彬，并且顺利地得到了李文彬的认可。后来，陈群担任了李文彬大队的副大队长。陈仲三到上、下苇店一带组织了第三大队（李文彬大队命名为平西游击第一总队，下设三个大队，一个特务队）。父亲积极配合邓华支队扩军，将县大队编入了八路军正规部队。邓华支队由原来的一个团扩大到了两个团。

三、四叔国臣牺牲在冀东

1938年5月，宋时轮支队开往平西，与邓华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并开赴冀东，参加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李文彬大队编为第三十三大队的一个营。东进途中，四叔魏国臣领导的第一中队改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部警卫二连。冀东暴动失利后，部队撤回平西时，警卫二连留下坚持冀东抗战。并以这个警卫连为主力，成立了冀东抗日游击第一支队。支队长是陈群，政治委员是苏梅，政治部主任是周文斌。四叔魏国臣升任第一支队第一总队队长兼教导队队长。

教导队是将西撤时打散的干部战士（抗联队伍）收编组成。苏梅给教导队讲政治课，魏国臣讲军事课。使部队恢复战斗力，坚持冀东抗战。

1939年初春，四叔国臣化装后绕道返回平西，向上级汇报工作。见到了青白口村的乡亲，他的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女儿。然后义无反顾地带着任务返回冀东前线。人们哪能知道，这

一次相见竟是最后的诀别。在此前后，也有战友调回平西，而魏国臣始终团结带领战士们在冀东罕见的艰苦环境中坚持抗战。

他带兵能从教育入手，和同志们同甘共苦，先后发展了付作仁、李文华、李文举等加入了党组织。在向冀东挺进的道路上，边走边打，参加了多次战斗。完成了保卫司令部安全的任务。打永定时，他一马当先带着部队先打进去。每次战斗他都是冲锋在前，而条件不利时又总是留在后面。东进到抚宁县燕河营突围时，魏国臣带领全连在敌人的飞机大炮的轰击下最后撤出。他带着两个通讯员（吕怀玉、李文举）多次从炮火的泥土中爬起来。在铁厂参加了苏梅、陈群指挥的消灭7个土匪司令（土匪便衣队）的“鸿门宴”，缴了大部分的枪支，为冀东人民除了害。

1938年10月，主力部队撤回平西。一支队（苏陈支队）与敌500余人激战于滦县、丰润交界处之华山峰村，在陈群支队长指挥下，魏国臣带领战士抢登上制高点，连续击退敌人数次进攻后，转移到遵化茅山。11月，又遭遇到千余名日军围攻。魏国臣同陈群、苏梅一起，率领战士与敌人巧妙周旋，不仅消灭了敌人而且掩护了支队的的安全转移。

1939年春末，四叔魏国臣在执行上级指派的筹款任务中，在丰润县西佑国寺遭遇日军包围。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6岁。他在牺牲前最后的话是：“急速报告司令，任务完成！”消息传到队部，陈群、苏梅及部队战友们悲痛万分。同年底，苏陈支队回平西整训，改编为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二团，陈群任团长。苏梅调平北担任地委书记。在返回冀东之前，陈群把十二团带到了青白口村。平西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同时进行第二次开赴冀东的誓师动员。在会上，陈群声泪俱下地回顾了魏国臣的战斗事迹。他说：“国臣同

志的牺牲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他打仗勇敢，带兵有方，是我党我军的优秀的年轻指挥员。好干部，好党员。他的牺牲使我失去了一只臂膀。”他振臂高呼：“我们要打回冀东去，为魏国臣同志报仇！”我父亲魏国元代表地方和烈士家属讲了话，他号召人们化悲痛为力量，打回冀东去，将抗战进行到底！会场周围扎着白布帐，到会的人们唱起了为魏国臣谱写的歌曲：“秋风吹来真凄凉。国臣同志武装上战场。别妻子离家乡，一心打东洋，冲锋在前不怕日军狂！……为民去抗战，先进成模范，为国把身捐，英名永留传！”

魏国臣成为早期牺牲在冀东的著名烈士，成为平西家喻户晓的为国捐躯的模范。他带动了平西众多的子弟开赴前线，勇敢地牺牲在冀东、平北、东北以及光复国土、解放全中国的战场上。（见《八路军军政杂志》民国二十九年二卷八期《悼魏国臣唐月樵两同志》）。

四叔魏国臣牺牲了。二叔魏国杰去冀东后杳无音信，不知是死是活。在长时间的思念担忧中，魏国杰的妻子得了重病，兵荒马乱，死于1940年日军扫荡中。

四、三叔国相牺牲在张北

1940年秋，日军对平西进行大扫荡，当时家中只有三叔魏国相。他是村干部，带领村里乡亲们疏散。奶奶曾在前些时候日军飞机轰炸时，从石阶上摔下来，摔坏了大胯骨，不能行走。她坚决不让儿子背她走，而实际上三叔也来不及背她走。三叔把母亲藏在山神庙的炭窑中，放了一碗饭。他告诉母亲先去安顿好了乡亲，很快就回来背母亲。但是日军很快就进村了，三叔回不来了。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奶奶爬出了炭窑，拼着全身的气力向山里爬去。11月的天气，天寒地冻。奶奶孤身一人冻饿而死在深山。后来当人们找到她的时候，她的长发披散，散乱地缠绕在灌木丛的荆条树枝上。

奶奶死后，三叔也离开家乡参加了脱产的工作。1942年，三叔曾任昌宛县二区区委书记，之后去平北开辟工作，任张家口地区尚义县第四区区委书记，1946年被敌人杀害，年仅35岁。

五、父亲和二叔国杰的简历和逝世

在平西抗日根据地建立后，我父亲历任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宣涿怀联合县长、涞涿联合县长、平西地区专员公署秘书室主任、副专员、专员、地委委员、晋察冀边区参议员。1949年参加随军干部团，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长江，解放全中国。任湖南省邵阳专区专员、湖南省民政厅副厅长。1953年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办公厅主任、农田水利局局长、农田水利研究室主任、水利电力出版社社长、水利电力学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1960年5月2日病逝，终年54岁。

二叔魏国杰于1937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后，历任李文彬大队医务队长、冀东抗日游击队第一支队（苏陈支队）医务队长、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二团卫生队队长、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三团卫生处处长、冀东军区修养所所长、冀东军区卫生处副处长、热河军区卫生部副部长、辽西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荣立大小战功多次。他曾在冀东极艰苦的环境中，与一个卫生员坚持在荒山隐蔽躲藏，饥寒交迫，等待着部队的集结。全国解放后任解放军公安三师卫生部部长、第一军政干部学校卫生处处长、转业后任全国总工会医务工会主席、一机部哈尔滨综合医院院长。1950年，全国解放不久，长达12年没有音信的魏国杰试着与家中联系，却不知道给谁写信方能收到。只好写“青白口村乡亲收”。不久，魏国杰终于带着警卫员和再婚的妻子回乡探亲。并将四叔国臣的12岁的小女儿收养。1960年，魏国杰参加了大哥魏国元的丧事活动之后，他回到哈尔滨，9月突发脑溢血去世，终年51岁。

人民抗日在宣南

□ 王克昌

在全面抗日爆发80周年之际，回忆和整理京城宣南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让广大青少年不忘共和国的诞生是多么不容易，日本帝国主义多么残忍，人民的反抗又多么坚决，接过革命的接力棒继续前进，为实现祖国富强的中国梦，做出自己的贡献。笔者长期搜集抗日时期的革命遗址，今仅谈几处比较重要的地方，供后来者学习和参考，望亲自走访，增加印象，永传后世，继承光荣传统。

1. 广安门。明朝嘉靖三十二年（1553）兴建，称广宁门（至今白广路北口的街心花园，名为广宁花园纪念此门），至1820年道光皇帝上台，为避皇上旻宁的名字，故改为“安”，由此称广安门。此门非常重要，是南方人从陆路进京的重要通道，故皇帝批准出资修此道。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卢沟桥，步步向城内逼近，7月26日19点钟，五百名日军驾驶两辆坦克、12辆载重军车、五辆运兵车，在顾



广安门城楼

问中岛、樱井和军官佐藤茂带领下，耀武扬威地压向广安门。他们向29军驻军官兵喊道：“我们只想参观参观，没别的意思，请打开城门！”将士在刘团长带领下将计就计。刚一进城，枪弹如雨般射向日兵，牛街民先队员和居民手持宰牛刀、棍棒、铁锹

等包围了卡车。佐藤茂命丧刀下，樱井慌乱中掉进粪坑，中岛窜得飞快，敌兵死30余人，伤80余人，坦克、军车被毁。22点日军被击散，残兵败将乱窜，甚至逃到百姓家中哭喊求饶。29日侥幸没死的中岛由汉奸周思靖借翻译向29军喊话，想跟刘团长交个“朋友”，等把枪瞄准中岛时，他调头就跑。此后日本报纸惊呼“广安门事件”。一位署名“老向先生”写出《大战广安门》的唱本。“倭寇直扑广安门，轰轰烈烈一大群。鬼子进城到一半，一声炮响撩城门。城上我军齐呐喊，血海深仇今日伸。居高临下得地势，炮弹枪弹如雨淋。日西杀到大黑天，半千只剩几百人。百名日寇齐跪下，两手大摇白布巾……”唱本真实地记录了广安门事件的前前后后，客观地报道日寇侵华罪行和军民抗战的勇气，大长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

2. 除奸斗争。1937年7月7日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抗战的日子，同时又是日寇侵占北平的屈辱日。1940年7月7日，汉奸特务为了纪念日军侵华三周年，无耻地召开庆祝会，地点在中山公园社稷坛台上。布置彩旗彩带彩花，“庆祝日本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标语下，日伪新民会机关报《新民报》社长、总编辑吴菊痴（？-1940.7.7）副总编辑陈辘子等丑角登场大肆表演、吹捧日军谩骂抗日居民。台下有秘密爱国组织——北平抗日杀奸团团员。其中19岁的热血青年冯运修（1921-1940）气得牙齿嘎嘎作响，小声对同伴说：“真想现在就把他毙了！”他，指的是总编吴菊痴。收场了！吴社长和陈胖子（陈辘子体胖）说完后雇了辆黄包车驶离中山公园，前往宣南李铁拐斜街同和轩饭庄就餐。急于行刺的冯运修尾随其后。到后发现不便于行刺，于是在饭庄门口等候。21点半，酒足饭饱的两个汉奸雇车回到宣内大街。当车子行到和平门外大街时正遇上刘王氏家里办丧事，街上吹吹

打打又哭又闹，排着长长的队伍，人力车子速度减慢了。时机到了，机智勇敢的冯运修快蹬几下自行车，与人力车并排，说时迟那时快，他“唰”地掏出勃朗宁小手枪朝汉奸“啪啪”两枪，吴社长当即扭过头去，人力车夫周德立还未察觉，冯运修等人撤退了。伪警察局得知，急忙将人送到虎坊桥东侧市立医院，车子开到陕西巷南侧，吴社长就急急忙忙“升天了”。接着就是全市大追捕！在大追捕过程中，冯运修不幸壮烈牺牲，终年19岁。

烈士冯运修河南开封人，字兰英，北平弘达中学毕业后，继续天津工商学院，1940年刚考入辅仁大学，尚未入学即壮烈牺牲。烈士生前从事抗日运动的地方如今是铁树斜街、师大附中校门口，吴社长“升天”的地方也在宣南。

3. 天桥与“一二·九”运动。1931年“九一八”之后，日寇野心勃勃占领我东北、热河之后又进逼平津。南京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1935年“一二·九”运动在华北展开了。北平的爱国学生几次举行轰轰烈烈的大游行，高呼口号，打着抗日的标语和校旗，不畏严寒，不怕军警的阻拦走向街头。12月16日那天，他们利用宽敞的天桥空地召开2万人的大会。这是第一次市民大会。大会通过几项决议，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等等。接着，又在前门楼子西车站广场召开第二次市民大会。大会通过反对秘密外交等9项决议，会后又继续游行。



天桥市民大会会场



天桥大会后，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珠市口汇合



辅仁大学游行队伍奔向天桥

“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历任北平市委书记的俞启威同志，扶着电车向与会群众发表激动人心的讲话，台下有宋黎（1911-2002）等学友护卫。“一二·九”运动在我国学生运动史上是一个光辉的范例，它为知识分子，指出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两次市民大会均在宣南范围内召开，尤其在天桥2万人大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俞启威（即黄敬）在宣南留下珍贵的足迹！

4. 大闹华北戏院。珠市口西大街路北、煤市街南口有著名的丰泽园饭庄，清末这里是文明茶园。1907年中秋节名角王又宸、谭小培、侯喜瑞、尚和玉、侯俊山、喜彩莲曾在此演出。这里，民国中期改为华北戏院，喜彩莲长期在此演出评剧。1943年的冬天，中共地下党联络员杨子健（1906.10.29-1992.11.27）曾在此痛打日伪特务。

杨子健生前，笔者多次找他，与他畅谈在宣南的抗日活动，他不平凡的经历每每使笔者受到深刻

的爱国教育。

5. 门框胡同西服装店。大栅栏街路北的门框胡同可是个老北京卖小吃的繁华地段。这条胡同与廊坊二条相交处的西北角，有个西服店，工人们整天忙于裁剪缝制，买卖可兴隆了。日本统治时期这里是冀中城工部秘密联络点。在这里秘密工作的张川泽、王树馨（1921-1997）为推翻三座大山、抗击日寇秘密工作直到全国解放。1943年3月，原籍为河北省安平徐召来村的王树馨来北平后就是在这里接下组织关系的。在张川泽指导下，王树馨报考警察职业。经过5个月的培训，他成为户籍警察。他依照警察身份给出入北平的地下党员办理良民证，掩护地下工作的领导同志（如赵凡同志），为他们找住房，办户口，保证他们的安全，并且广交朋友，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地下组织。在秘密工作中他不幸被捕，睿智多谋、随机应变的王树馨编造口供哄骗敌人，使他转危为安。

王树馨生前笔者见过他，他很健谈。他指给我的西服装店旧址，使我久久不能忘记，尤其不能忘记在抗日斗争中他的所作所为。

6. 同仁堂。提起大栅栏名店同仁堂药店，北京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世界也著名，产品远销海外，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它创建于清代康熙八年（1669），康熙四十一年（1702）在大栅栏开办药店。当人们从宫灯高悬的三层仿古彩楼漫步进入辉煌的药店大厅时，不曾想到，同仁堂的东家——乐家，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经是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机关，中共中央社会部金库的所在地。老东家乐元可先生的表弟杨宁是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陈叔亮地下情报组织的党员，从1939年到北平开展情报工作。在杨宁的教育启发下，乐元可的夫人李铮也走上革命道路。夫妇把乐家大宅门里的书房、客厅、客房收拾干净作为地下党研究工作场所。乐元可在抗日最艰苦时期通过地下党张有恒，将同仁堂中成药无偿捐给缺血少药的解放区，支援抗日战争。有许多这样的照片，老百姓在为伤病员喂药，其中就有同仁堂捐出去的药品。贺龙元帅有用烟斗吸烟的习惯，也是通过地下党张有恒买的烟斗转送

给贺龙的，这是后话了。总之，同仁堂在抗日战争中，以及解放战争中做出不小的贡献，它将永远记载在红色史册之中！

7. 崇效寺。闻名中外的古刹崇效寺一千多年来一直被人们关注着。它原是唐代幽州节度使刘济（757-810）和夫人的私宅。2013年8月中旬房山区长沟镇刘济和夫人墓志重见天日，备受瞩目，轰动京城。《京师坊巷志稿》载：“元至正初，以唐贞观元年所建佛寺赐崇效。嘉靖辛亥，太监李朗于寺中央建藏经阁……所植枣树千株……王渔洋改名其为枣花寺。”清初著名大诗人王渔洋来此赏花，把崇效寺改为枣花寺。由于枣树闻名至今，寺的北侧以枣树命名街巷仍在，如枣林前街、后街。唐朝以来许多名人在此留下足迹。清乾隆以来由于丁香花牡丹花闻名全国，吸引了杨椒山、林则徐、鲁迅、朱德等人的观赏。尤其值得纪念的，这里是地下党秘密活动的地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民积极要求抗战，掀起反对日本侵略的热潮。北平进步学生纷纷来到京城财政部印刷局，联系工人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人选出李振峰等9名工人为代表与学生代表联系。他们商讨集会的地点就选定了离财政部印刷局不远的崇效寺里。朝阳大学进步学生王辑五也与李振峰等人联络，秘密活动频繁。接着，进步学生带领李振峰到下斜街云山别墅的北下房两间屋内，举行入党宣誓，从此，崇效寺成为地下党员组织工人宣传抗日、与资本家斗争的重要场所。1932年1月财政部印刷局诞生了第一个党支部。后来王辑五成为北平市委书记，李振峰升为北平市委委员、职工部部长，领导全市的工人运动。

秘密党支部活动引起官方的注意，企图扑灭红色烈火。当局呈文：“查本局崇效寺内，近有外来帮匪对本局工人鼓动煽惑，不遗余力，致近日本局各工厂遂起事端，请贵公安局、市政府、司令部将该会立即查封，并将为首滋事之帮匪密拿严讯，以绝祸根。”数日之后，又密令公安局派警来崇效寺对抗日救国的集会予以查禁，迫使在这里成立的救国会转入地下活动。直到上世纪30年代本期财政部印刷局的党支部工作仍在进行着，崇效寺内的抗

日烈火仍在继续燃烧。

8. 聂耳的足迹。国歌的作曲者聂耳在那短促而光辉的生命里程中，有3个月是在北平度过的，1932年8月住在他家乡的云南会馆，宣武门外校场头条7号（旧门牌3号）。九一八事变之后，聂耳怀着对日寇的愤恨、对祖国危亡的忧虑，积极参加文艺宣传活动，唤起人们的觉醒！他来北平努力学习小提琴，不断提高演奏水平，他拜俄籍小提琴教授为师刻苦训练。积极筹备组建北平左翼作家联盟，主持讨论北平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组织大纲，促使“北平乐联”正式宣告成立，并参加“乐联”的演出。应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之约撰写文章，参加清华大学东北同乡会为抗日义勇军募捐演艺会，并登台演出《国际歌》。他还几次到天桥驻足，到底层社会了解劳动人民生活的惨状。他日记中写到：

“这儿是一个低级社会的缩影，什么卖艺的、唱戏的、变把戏的，无奇不有。”他说：“在这儿，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他们在狂吼、乱叫，好像些疯人样地做出千奇百怪的玩艺，有的在卖嗓子，有的在卖武功，这些吼声，这些真刀真枪的对打声，锣鼓声……这是他们生命的挣扎，这是他们向敌人进攻的冲锋号。”冲锋号确实吹响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前奏曲，就是中国人民反抗一切黑暗势力的冲锋号声，就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冲锋号声！让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觉醒，前进！再前进！这样说来，聂耳的代表作《义勇军进行曲》，还有我们天桥人民的心声呢！

9. 北师大。位于和平门外，在琉璃窑旧址兴建起来的北京高等师范学院（后改名为北师大），在北京近现代革命史册上有着光辉的纪录！尤其是五四以来，这里的爱国学生，这里的优秀共产党员师生谱写着为推翻三座大山英勇奋进的乐章！在宣南红色史册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从1931年日本侵华，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这里有14年的奋斗历史。本文只是稍稍介绍几个片段。九一八事变后，北师大学生抗日救亡的情绪十分高涨，自发成立了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领导机构——抗日救国会执委会。李维任宣传部长。他回忆，在地下党支部领导

下，抗日救亡活动很快就开展起来了。在校内外张贴标语，印刷传单。还组建了一个十人左右的宣传队，学生自费到平汉线的长辛店、保定、正定、石家庄4个地方宣传抗日，



聂耳像



聂耳在云南会馆与同乡合影，前排右起第二人为聂耳



聂耳作《义勇军进行曲》手迹

宣传九一八背景，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团结抗日，一致对外。1934年该校组织了“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做一些发展组织和对敌斗争的工作。不久又组织读书会，经常学习《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读书会还编辑了一套《骆驼丛书》三册。

《现代哲学概论》《唯物史观世界史》，翻译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接着在1935年夏秋之间黄河决口，华北地区洪水泛滥成灾，北师大杰出的党支部书记周小舟（1912.11.11-1966.12.26）领导师生开展赈济活动。水灾赈济会成立后募捐衣物五百件、三百余元，赈济会代表参加北平水灾赈济会代表团去外地慰问。师大的师生们在外地利用演讲、唱歌、演戏等各种形式揭露国民党腐败统治。使受灾群众认识到在水灾中拯救自己的是同胞们，这为不久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反对日寇的入侵，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一二·九”当天的学生示威游行，前面已经写过，需补充的是北师大师生是这场运动的主力之一，许多师生在王府井南口遭到军警的大刀、水枪的镇压，多人受伤。在严冬时节学生身上、脖子里是冰水、是血迹，寒风一刮那是怎样一个情形？

“一二·一六”那天，北师大师生又出发了，奔走呼号一天，忍饥挨饿，十分疲劳，决定回校。当时游行队伍走到菜市口附近时，已经是近21点了。军警熄灭了路灯，堵死前后道路和胡同，用皮鞭、木棍、枪托、大刀对同学们大打出手。军警对三百多人咒骂和毒打，甚至侮辱女学生。60多人受伤，大约深夜12点钟，游行队伍才回到学校。

如今，菜市口附近的小胡同尚在，北师大校舍还保留一部分，看到这些旧址，80多年前为拯救祖国危亡而流血牺牲的热血青年的业绩应该永传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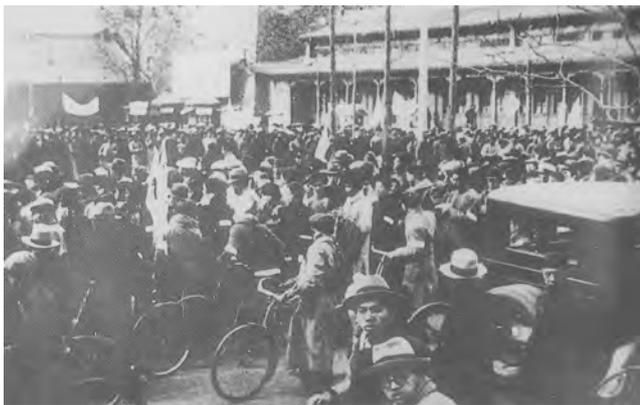
在宣南大地上，还有许多抗日的优秀事迹和遗址。如，东琉璃厂住着受到党中央表扬的抗日英雄马占山先生；宣外大街一些会馆住着抗日时期地下工作者；第一监狱关押着抗日烈士等等，在此不赘述了。



“一二·一六”天桥市民大会



“一二·九”运动中被阻于宣武门外的游行队伍



汇集在前门外的游行队伍



会合后的游行队伍经过前门大街

杨子健——宣南隐蔽战线的抗战英雄

□ 范苑

提起北平的抗战英雄，我们通常会想到赵登禹、佟麟阁这些正面战场著名将领的名字。而我提到这位英雄并不是很有名，但他却潜伏在敌后战场，为党的情报工作做出了许多贡献。1937年7月29日北平彻底沦陷后，北平的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开始转入地下，在秘密的状态下工作。这位英雄就是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主要在宣南地区活动的回族代表杨子健。

杨子健，1906年出生于河北新城县。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1941年日寇在冀中平原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抢夺了许多农民的粮食。杨子健当时担任县回民建国会组织部长，他在县大队的配合下，广泛发动群众，以北平、天津、保定交叉的重镇白沟为中心，捣毁了日寇的粮库，抢粮上万斤。那一夜上百名乡亲赶着马车、推着板车来分粮食。这件事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

为了更多地了解这段农村抗战过程，我专门采访了杨子健的长子杨德山先生。杨先生说这件事当时在冀中影响非常大，解放后八一厂拍过一个很有名的电影《粮食》，就是以这一事件为原型改编的。杨先生还讲述了另一次惊险的被围剿经历。当时日军将县大队和区小队的百余名同志团团包围在白沟白辛庄，杨子健领导的回建会与村民商量研究后，决定把他们化整为零，掩护在自己家里，论成父子、夫妻、兄弟等家庭关系，十几天的时间没有一个人暴露消息，直到日军离开。

之后杨子健接受组织派遣，进入北平营救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参谋长贾森林。他在丰台巧妙地利用一些关系，成功策反了伪宪兵大队长马岐山，机智勇敢地 from 牢狱中救出了贾森林。随后杨子健也转到北平城内工作。

1942年，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领导

下，牛街建立起了回民支部。支部在吴家桥三条联系回民群众，组织大车队为抗日根据地转送报纸及运送煤油、西药等物品。杨子健就是这个支部的成员，他在宣南多处设立秘密联络点，多在一些清真寺以及回民开设的茶馆、纸烟店、油店、烧饼铺等商号中开展群众工作。

为了具体了解他这一段从事活动的细节，我还采访了宣南文化博物馆顾问王克昌老师，他曾经20余次采访过杨子健本人。据王老师介绍，杨子健经常巧妙地利用少数民族的乡亲关系从事活动。同一个民族容易拉上关系，群众感到亲切，加上绝大多数回民对日本人特别痛恨，杨子健又有着可贵的爱国之情和斗争勇气，就更值得信任。于是这些清真寺的乡老和回民商号为由抗日根据地来到北平工作的同志安排住处、介绍职业、办理证件、购买物资等等。杨子健在京城活动地点大约有三四十处，在宣南地区主要的活动地点有这样一些：椿树地区的校场口、骡马市大街1号、大栅栏地区的车辇胡同13号、培智胡同12号、石头胡同的恒兴奎纸烟杂货店、蔡家胡同的天德庆纸烟店，天桥地区的祥聚公糕点铺、信记镶牙馆、陶然亭地区的南横街、果子巷等等。还有一处在敌人眼皮底下，就在离我校不远的盆儿胡同。胡同中部的张家祠堂当时是日本警备司令部，曾杀害过不少革命群众。胡同北端西侧的王记清真烧饼铺，就是杨子健秘密的活动地点。他还在这个烧饼铺发展了王文启、王文山兄弟二人入党。

1943年冬天，杨子健的战友张明被毒打，惨死在日寇的监狱。杨子健利用特务刘灿将他的遗体运出监狱安葬。为以后工作方便，杨子健请刘灿等人在煤市街的华北戏院看演出。当时戏园里到处是便衣特务，他们看到杨子健等人行为可疑，便发生



采访杨子健长子杨德山

了口角冲突，随后双方扭打起来。老板不敢得罪特务，也跟他们纠缠，不依不饶地要求赔偿损失。情急之下杨子健拿出伪造的特务证，老板的凶脸立刻变得蜡黄，他们得以迅速脱身。

杨子健的这张伪造的特务证是怎样弄到的呢？原来在策反丰台伪宪兵大队长马岐山后，党组织仍让马岐山留在原职务中，以利于抗日。后来他利用职务之便保释了不少地下党员。杨子健大闹华北戏院亮出的“中曹1886部队”特务证就是马岐山帮助

搞到手的。这张特务证成为了他从事隐蔽活动的护身符。

抗战结束后，杨子健继续负责掩护转移来往北平的地下工作者。解放后他担任了牛街街道办事处第一任主任。

据杨德山先生回忆，抗战时期担任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工部部长、后担任过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同志曾赠送给杨子健一支博士牌的钢笔，并充满深情地说：“我非常佩服你在情报战线的工作”。这支钢笔在杨德山参军时，他的父亲又郑重地交给了他，以示激励。

在采访的最后，作为英雄的后人杨德山先生挥毫写下了两幅字，寄语我校的同学们。一幅是回族英雄马本斋的《抒怀诗》：“风雨多变山河愁，雁叫霜天又一秋。男儿空有凌云志，不尽苍江付东流。”第二幅是：“江山万代红”。这些话寄希望于我们一代代的后来者继承并弘扬像杨子健等许多革命先辈的精神，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不断作出自己的贡献！



杨子健长子杨德山手书两幅字，寄语我校学生

一位档案人的历史档案 ——记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参加者胡敬一

□ 韩春鸣



胡敬一

近些年来，笔者较多时间关注和研究平西抗战历史。在采访当事人和查阅相关历史资料以及浏览当事人的回忆录时，经常看到胡敬一的名字。应当说，在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早期活动中，胡敬一是卓有贡献的。但是，在新中国建立后，胡敬一的下落却少为人知，对胡敬一较为完整的人生经历，更是鲜有人知。

2015年，笔者在进行平西抗战史资料的搜集与编撰工作中，发现胡敬一相关史料。

北京市老市长、中顾委委员、十八大年纪最长的代表焦若愚，在1986年5月28日的回忆中提及：“1937年9月初，我受中共北平市委委托，护送北方局的胡敬一同志去晋察冀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请示和汇报工作。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宛平山区（今门头沟区）。当时我把胡敬一送到妙峰山的苇店（具体是上苇甸还是下苇甸记不清了）。胡敬一又从苇店去了青白口魏国元那里……胡敬一去苇店时，卫立煌的部队还在和日本人交战，飞机还在轰炸”。

笔者在采访老市长焦若愚时，焦老讲：“我所在的抗日队伍在去蔚县途中，遇到了从太原返回的胡敬一及同来的八路军总部的12位同志。胡让我留

下，一起返回了青白口村。我们就在青白口魏国元那里扎下了营，并派人和北平地下党取得联系，刘杰（时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员）、苏梅、胡敬一、魏国元、陈群、我及李光汉成立了平西工作委员会，还成立了平西游击队”。

从焦老的回忆中可以得知，胡敬一是中共北方局的干部。焦若愚第一次去平西，其主要任务就是护送胡敬一；此外，还让我们了解到，胡敬一当时担任过中共平西工作委员会的领导职务。

担任过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顾问等职的彭城，是门头沟区太子墓人，1937年入党，抗战时期担任宛平县政府的领导。1986年5月27日，彭城回忆道：七七事变后，胡敬一就住在青白口魏国元家。

魏国元，是北京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宛平县县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水利部办公厅副主任、水电学院院长等职。他在自传中提及，他在被捕出狱后，恢复组织关系的过程：“1936年夏季恢复了自由，约在八九月间，组织上派王恒（1942年在平西根据地见过面，现在不知下落）贺某某二同志和我取得联系，又经胡敬一（1946年在涞源石棉矿工作，现在不详）、赵某某（笔者认为应是赵振生，即李葆华）恢复党籍”。

王恒当时是中共北平市委的联络员，在魏国元出狱后的第一时间，王恒与魏国元见面，了解魏国元的基本状况，而后才由胡敬一和赵某某正式决定恢复魏国元的党籍。这一点说明，胡敬一在北方局所承担的工作性质和相应工作任务。

魏国元恢复党籍以后，中共北平市委农委书记张毅之（即刘杰，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担任河南省委书记等职）见面魏国元，正式向魏国元交代工作任务。

1986年5月26日，刘杰接受魏云平等人采访时，回忆道：“1936年3月，我在北平任地下党西郊区委书记。1936年7月，魏国元出狱后在北平，我和魏国元见过面。有一次记得比较清楚，就是派魏国元回到家乡去组织打游击，派他去做开辟的工作。”

七七事变前我就知道他是青白口人，在地方上有些老同学、老熟人，有党内党外的关系。（那次）见面的内容是把宛平县、田家庄一带党的工作交给魏国元领导。魏国元出狱后，当时是什么人介绍我的记不清了，可能是胡敬一。

刘杰对当时中共北平市委领导班子的回忆：1937年3月，我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当时市委书记是黄敬，组织委员安子文、学委蒋南翔，我是农委。我担任农委书记。

王恒回忆：1937年春，上级党组织调张毅之（现名刘杰，原河南省委书记）接替孙德香同志的工作。三月间，张毅之同志和我找魏国元同志，（魏国元）住在北平城里大兴县胡同老庞同志家里。去找老魏同志的目的是什么？现在回忆，大约是将田家庄一带地下党组织交给老魏同志统一领导。

王恒讲：1937年冬初，地下党北平市委决定以张毅之同志为首，有宛平七八两区地下组织负责人



草岚子军人反省院内

魏国元同志和我组织平西地委，张毅之任书记。我们接受任务后第二天，便启程去宛平七区青白口魏国元同志家。同行的还有李光汉、王子展（他俩是去根据地学习的）……我们到达青白口老魏同志家里时，便与吴伟同志等12名战士组成的八路军先遣队相会合，直等北方分局的老胡同志（名字记不得了）从晋察冀边区回青白口。老胡同志指示，取消北平市委组织的平西地委。并指示将所有外来的同志，加上宛平七八区地下党的同志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支队，支队总部设在青白口。胡某某、张毅之、魏国元同志常在总部。

这个胡某某，无疑就是胡敬一。胡敬一居然可以撤销北平市委的决定，说明他是北方局的特派员而不仅仅是联络员。他能够代表北方局做出相关指示，并可以在成立军事组织方面拥有话语权。为什么撤销北平市委的平西工委呢？相关人员回忆，胡敬一认为，平西是晋察冀分局和军区的工作范围，应当隶属晋察冀领导。胡敬一在随之成立的平西八路军独立第一支队担任党代表，是这支队伍党的最高领导人。这应当是第一支由中共党人直接领导的



第二排左起胡敬一

战斗在平西的抗日队伍。

2006年11月20日，焦若愚回忆：我到阜平时，聂荣臻曾单独找我谈话，听我汇报。胡敬一还带我见过黄敬同志（当时他是北方局的）

笔者与国家档案局研究馆员郭银泉谈起胡敬一在平西的战斗历程时，郭告诉笔者，胡敬一曾经担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

由此，笔者找到了胡敬一较为完全的简历：

胡敬一（1902-1972）河南省滑县人。1930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河南滑县县委书记，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代理县委书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担任北方局联络员，曾经担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科长、股长、敌工队长，八路军驻易县石棉场代表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共北京市第八区委副书记、广州市北区委委书记、广州市监察委员会书记、广州市委常委等职。1966年1月，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1974年1月3日，胡敬一在“文革”中含冤辞世，享年72岁。

笔者从一些史料中获悉：胡敬一原名侯介槐，又名侯紫宸，1902年生于河南滑县华家村一个清贫的书香之家，1921年入河南省立第四农校学习，1922年考入汲县河南省立第十二中学。后因闹学潮，被学校以“行为不轨”名义开除。

1923年10月初，侯紫宸进入北京宏达学院学习。这期间，他阅读了《新青年》《努力》《向导》等进步刊物。1924年6月，考入河北大学。他与同乡及十二中学同学聂真经常在一起探讨革命道理，并结识了北大学生、共产党人郭小仓。

1929年暑假，在郭小仓的支持下，侯紫宸与聂真回滑县开展革命活动。他们通过社会关系打进国民党滑县县党部（此前两人已经取得国民党党员身份），侯紫宸担任县党部常委，聂真担任党部委员兼组织部长。他们成立了“清算委员会”，开展清查土豪劣绅账目、反对贪污的斗争。

1929年秋，侯紫宸从河北大学毕业。秋末，侯紫宸与聂真一起发动滑县农民开展抗花生税的斗争。侯紫宸、聂真以“农民协会”名义组织3000余农民在县城文庙举行请愿大会。侯紫宸在大会上登台演讲，痛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坚决要求取消花生税。他们把国民党县长刘卓叫到会场展开说理斗争。迫使刘卓当众宣布取消花生税。

当年冬，侯紫宸约聂真以国民党县党部名义在滑县城里文庙成立了滑县县立中学并担任校长。他利用讲政治课、秘密集会等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滑县引起很大反响，引起国民党滑县官员的恐慌。他们惊呼“滑县赤化了”“共产党就要在滑县搞暴动了”联名向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写信状告侯紫宸等人。1930年夏，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以“言论荒谬”“行为不轨”罪名，撤销侯紫宸和聂真在滑县县党部的职务。

侯紫宸与聂真被革职后返回北平，经郭小仓和冷楚（时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介绍，中共北平市委批准，1930年11月，侯紫宸和聂真加入中国共产党，侯紫宸担任中共北平沙滩支部书记。

当时，中共北平市委隶属中共河北省委，黄河以北、京广线以东的豫北地区党的工作也归河北省委领导。1931年春，为了在滑县开辟党的工作，经

中共北平市委和河北省委批准，侯紫宸和聂真返回滑县。4月份，侯紫宸谋到滑县县立师范学校教导主任职务，以此为掩护，筹建滑县中共党组织。5月，侯紫宸、聂真与在国民党县党部时的同事刘子明、孙子方以去孙子方的老家井店集赶集为名，至距井店集不远的濮阳化村（今属内黄县），找到濮阳中心县委书记王从吾，接上了组织关系。

1931年6月至8月，侯紫宸和聂真先后在滑县县城、桑村、瓦岗建立了3个党支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滑县独立区委，由侯紫宸任区委书记。1931年11月，滑县独立区委扩建为滑县县委，由聂真任书记，侯紫宸任组织部长。

1932年10月8日，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接到密报，亲自带兵来到滑县捉拿聂真、侯紫宸。聂真、侯紫宸事先得到情报分头躲避起来。不久，聂真离开滑县，滑县县委改组为工委，侯紫宸担任县工委书记。稍后，侯紫宸到濮阳中心县委任组织部长，濮阳中心县委书记王从吾调走，侯紫宸代理中心县委书记。自此时开始，为方便秘密工作，侯紫宸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胡敬一”，以后长期使用这个名字。

1933年8月，组织上调胡敬一任中共直南特委秘书长，在赴特委所在地邯郸路经成安时，被敌人察觉，遂以共产党嫌疑名义，将这个化名“胡中田”的人解送到国民党北平军事委员会领赏。

在国民党北平军事委员会审讯过程中，“胡中田”屡受酷刑，拒不招供。终因搜到其身上携带的印有直南特委字样的盖着印章的文件，以此为证据，于1934年10月判“胡中田”有期徒刑五年，将其押送到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服刑。

胡敬一与草岚子监狱秘密党支部接上组织关系。支部成员薄一波、殷鉴、杨献珍、安子文、周仲英等人听取了胡敬一的革命斗争经历，鼓励他要

坚守革命气节，坚定革命信念，与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胡敬一与难友们一起对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了有组织的斗争。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华北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新的高潮。共产党迫切需要大批经验丰富，熟悉北方情况并与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的干部来领导和组织华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做出了让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里的共产党员履行手续出狱的决定，并报告党中央，得到中央的批准。刘少奇亲自写信转送给草岚子监狱里的地下党支部，让他们履行出狱手续。

胡敬一出狱后，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七七事变前后，前往平西地区从事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在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录中，特意提及了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担任民运股长的胡敬一。胡敬一在易县（涞源）石棉矿工作时，搞到我军无法制造的大批黄色炸药，这批炸药的威力远比自制的土炸药大多了。

新中国成立后，胡敬一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八区（应是后来的宣武区、今天的西城区所属）区委副书记、广州市北区区委书记、广州市监察委员会书记、广州市市委常委等职。1966年1月，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

1974年1月3日，胡敬一在“文革”中含冤辞世，享年72岁。

今天，当我们回忆平西抗战历史，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年之际，不应当忘记胡敬一同志。

论北京胡同的区域特色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 朱祖希

提示：在往日，人们把居住区内供人们日常通行的小巷通称为“胡同”。但是，北京城里的胡同，无论就其长短、宽窄，乃至其成因，文化渊源都有不同，它们是北京生命印记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仅就此问题展开讨论，意在更好地保护翩跹它们。

北京胡同犹如“小桥流水人家”之与苏州，“粉墙黛瓦马头墙”之与徽州，客家“土楼”之与闽南，“吊脚楼”之与湘西……是不可或缺的。说得明确点儿，就是“没有胡同就不叫北京城”。

明清北京城是我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它完全是在中华民族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指导下，按照封建礼制秩序，以《周礼·考工记》所提出的营建国都的理想模式规划建设而成的。它所追求的是“天、地、人”合一，与宇宙万物和谐统一，并以此为最高理想，用以指导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建设中“象天法地”的匠意和“阴阳五行”的运用，使北京城的规划建设主题鲜明，而独树一帜、别具一格。

在北京城中象征封建国家最高权力的紫禁城（今故宫）位居城的中心位置，然后以皇城、内城、外城为标志，形成层层拱卫之势。其周围则以由街巷、胡同编织而成的供千千万万户居民居住的，大面积低矮而呈灰色的四合院，烘托着雄伟高大而金碧辉煌的紫禁城，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一个城市，以如此大胆的设计而形成的“皇权至上”的主题非常鲜明。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这样评论说：“中国的观念是十分深远和极为复杂的，因为在一个构图中有数以千万计的建筑物，而宫殿本身只不过是整个城市连同它的城墙、街道等

更大的有机体的一个部分而已……这种建筑，这种伟大的总体布局，早已达到了它的最高水平。它将深沉的对大自然的谦恭情怀与崇高的诗意组合起来，形成任何文化都未能超越的图案”。而丹麦的建筑和规划师瑞思穆森更是称颂：“整个北京乃是世界的奇观之一。它的平面布局匀称而明朗，是一个卓越的纪念物，象征着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

一个城市的街道布局犹如一个人身体的骨骼。它构架了这个城市的交通脉络，体现了这个城市的风格。而北京旧城的街巷、胡同，在经过我们的观察分析之后又可以这样说：北京的街巷、胡同，不仅存在着内城与外城的不同，而且即使是内城和外城之中，也存在有南北的差异和东西的不同。

一、东西长安街以北至安定门、德胜门一线

这一区域包括故宫、皇城和“三海”地区，原是元大都城的旧街区，也是北京街巷、胡同中最整齐规范的地区。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八月，徐达、常遇春两位大将率军北上，并攻破齐化门（今朝阳门），攻下大都城。洪武初，大都改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废东西之北光熙、肃清二门，其余九门仍旧。大将军徐达命指挥华云龙经理故大都，新筑城垣，南北取经直，东西长一千八百九十丈（约合6048米），又令张焕计度元皇城，周围一千二百六丈（约合3859米），又指令指挥叶国珍计度南城，周围凡五千三百二十八丈（约合17050米）……改元都安贞门为安定门，健德门为德胜门。城门为九，南三门：正南曰丽正，左曰文明，右曰顺承；北二门：左曰安定，右曰德胜；东二门：东南曰齐化，东北曰崇仁；西二门：西南曰平则，西北曰和义。（《顺天府志》）明朝洪武年间，当北平尚未成为新王朝的京城时，其范

围和城墙的情况大抵如此。这就是说，在明永乐年建都北京之前的北平城，也就是元大都城的大部。因此，可以这样说，这时的北平城，其道路街巷的格局完全是沿用元大都旧城的。

元大都城是元至元四年（1267）元世祖忽必烈时，由刘秉忠主持规划建设的。他舍弃了金中都宫城废墟，在金中都城的东北以大宁宫琼华岛太液池为中心，东建宫城和御苑，西建隆福宫和兴圣宫，形成了一个“三足鼎立”的格局。整个都城则是遵循《周礼·考工记》所载的有关王城规制，即：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将宫城放在全城中央略偏南，市场置于宫城之北的积水潭畔，太庙在宫城之左（东）即今朝阳门内大街以北，社稷坛在宫城之右（西），即今阜成门内大街以北。刘秉忠在规划元大都城的街巷布局时，一方面以纵横主干道各9条（即“九经九纬”，包括城内四面的顺城街在内）构成全城的道路网络。同时，又汲取了宋代以来封闭式坊制被打破后出现的开放式街巷制的道路形态；在“九经九纬”主干大道之间的居住区（坊），规划出等距离的东西向平行的街巷。这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见的最富特色的胡同。据熊梦祥所著的《析津志》记：元大都全城“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街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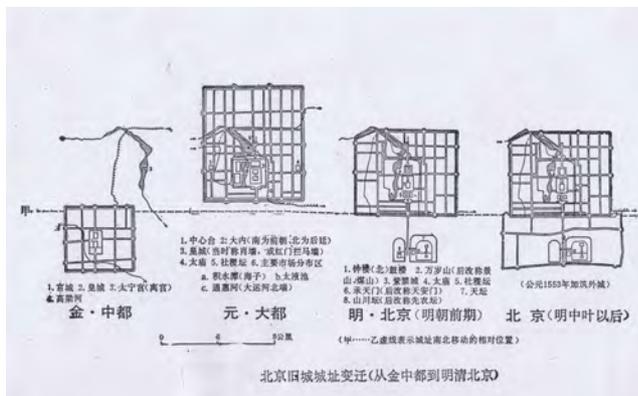
元大都城街道规划的基本模数是50步，这个数字即是两条胡同之间（胡同的中心与相邻胡同的中心之间距离）。一步为五尺，约1.58米（元代量地尺约合0.316米），50步即为79米。如果，我们以东城为例，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北京内城东西长

安街以北的街道图上，南北大街两侧胡同布局是极其规整的。如从朝阳门至东直门之间，即东四北大街至北新桥的大街两侧，有22条胡同。朝阳门内大街以北至东四头条胡同的距离，稍大于其它一般胡同的距离（79米）。同样，在东直门内大街以南至北新仓、瓦盆胡同、石雀胡同和土儿胡同之间的距离也稍大于其它一般胡同的距离。上述情况也已被考古学家在元大都东城垣光熙门至北城垣之间的胡同遗迹所证实。元大都城的大街宽37—38米，小街宽18—19米，胡同宽8—9米，火巷6—7米，与今天的实际情况也是完全相吻合的。如被列入历史文化街区的东四头条至十二条，南北锣鼓巷地区，雍和宫大街东西两侧的两片胡同区，西四头条至八条的胡同区等都是。

对此，意大利旅行家曾在元朝廷做过官员的马可波罗，就在其所撰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赞美元大都城“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城中壮丽宫殿，复有美丽邸舍甚多，各大路两旁，皆有种种商店屋舍。全城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屋舍。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造价由斯往来。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

直到今天，北京城里还保留着13世纪城市建设的实况，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北京旧城的历史和它所遗存的具有800年历史的文化遗迹及其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另外，还应该看到的是元大都城内规整的胡同同时存在的一个个大小不同的占地空间，诸如南北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太史院、国子监、大都路总管府、社稷坛、太庙、孔庙，还有大天寿万宁寺、大圣寿万宁寺（白塔寺）、大庆寿寺（即西单东北、西长安街北侧的双塔庆寿寺）、也可温十字寺和城隍庙等寺观。当然，这期间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元朝原有的建置一直延续下来，大建筑的方位未变。如国子监、孔庙、城隍庙等就基本上保持了它初建的占地范围；二是原建置的职能未变，其占地面积却在缩小，如大都路总管府就为明清顺天府衙署所沿用，但占地面积显然缩小，



只保留了中心部位；元朝原有的建置在元亡之后被废弃了，如南北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太庙、社稷坛、大天寿万宁寺和也里可温十字寺等，它们在街道分布图上仍清楚地保留着四框的整齐边缘，但框内的大建置被废弃后，便沦为民居，且出现了许多不规则的小胡同，如御史台、枢密院、太庙，特别是东直门内大街以南的新太仓，在元代便是仓库，明代被废毁之后搭建民居，形成了许多不规则的胡同。如九道湾、褡裢坑、罗车坑、八宝坑等杂乱无章的小胡同，它们与元大都城胡同的格局截然不同；明清两代新开辟的大建置建筑物，如西四的历代帝王庙、南池子和南河沿之间明代重华宫（南内），即清初的摄政王多尔袞府（后改为普渡寺即玛哈噶喇庙）等。

上述四种情况不仅反映了北京古代城市建设上的动态变化，也正是我们需要在街巷胡同的保护中需要引起注意的地方。

什刹前海、后海、前海；北海、中海、南海，自北而南蜿蜒而来，宽阔的水面既给北京城平添了无限的生机，也使得街巷、胡同随形而影，出现了许多变化。如后海南北两侧的羊房胡同、鸦儿胡同、北官房胡同、南官房胡同等，都是一些别具一格的街巷、胡同，与毗邻的德胜门内大街两侧规整的呈东西向的胡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从东西长安街以南至前三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一线

这是明永乐十七年（1419）明成祖定都北京展筑南城垣后所形成的区域。这一区域，在明清两代主要部署了大明门（大清门）至承天门（天安门）、千步廊两侧的中央衙署。这一地区的西部，即宣武门的街道、胡同，因受原中都城东北角和金口河和元大都南城墙护城河的影响，无有规划的余地，只能因旧街，地形修建，如浸水河胡同、头发胡同、西单手帕胡同、西安福胡同、东安福胡同等；而其东部崇文门内的街巷、胡同，大都是在元大都城东南郊的河道沟渠上形成的，如东西裱糊胡同、船板胡同、泡子河东巷均如是。

三、前三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以南



的北京外城

北京的外城是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开始修筑的，直到嘉靖四十三年（1564）才完工。它的修建完全是因为“北边告警”而当时“城外之民殆倍城中，无虑数千、万户，四方万国，商旅货贿所集，不宜无以围之”。外城南部的，东有天坛，西有先农坛之设。其西部大都利用金中都东城的旧街；东部除崇文门外的东花市大街北侧的上、中、下四条胡同，仍模仿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巷胡同的格局而外，其它皆因河道沟渠旧迹而改建。因此，多出现了不规整的胡同街巷，而给人以零乱之感。

正阳门大街东侧的胡同如长巷头条、二条、三条、四条及至芦草园、薛家湾胡同等都是一些呈西北东西向平行排列的胡同，便是受制于源自正阳门东护城河的三里河。这条被北京人称之为“东三里河”（西三里河在玉渊潭东）的小河原是发育在数

千年前流经什刹海、西海、后海、前海、北海、中南海，前门与供电局之间（据勘测，这里的河床曾宽达620米）东流向龙潭湖的古高粱河河床上的。而薛家湾胡同北边的草厂头条至十条胡同，又都是呈北向的。原来这些胡同，都曾是运输草料的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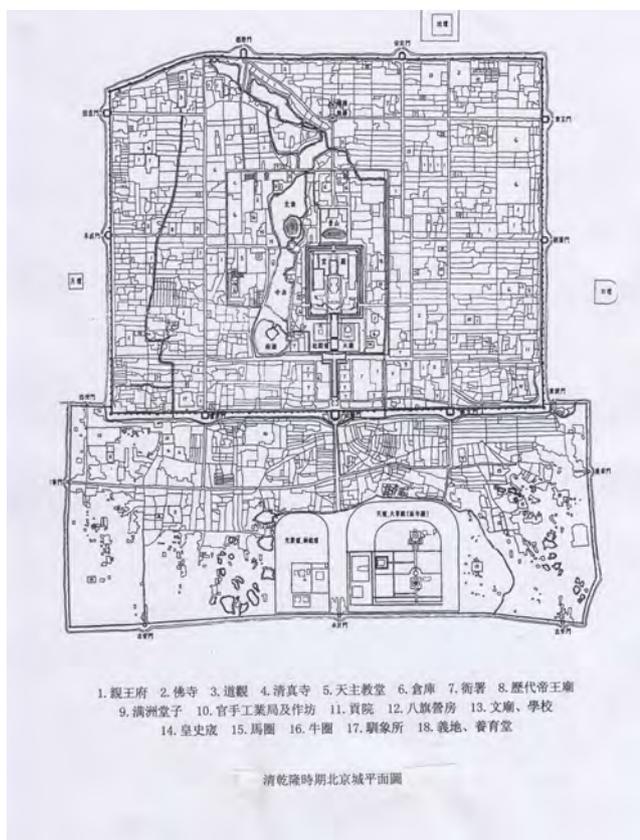
正阳门大街西侧的呈东西走向，由北而南排列的廊房头条、二条、三条、四条（清称大栅栏）乃是明永乐建都北京为繁荣国都的经济而设置的“召民居住，召商居货”的“廊房”的遗迹。而由大栅栏西街直奔虎坊桥的铁树斜街，则是元代修建了大都城之后与原金中都之间的通衢。与之相平行的还有杨梅竹斜街、樱桃斜街等。

在虎坊桥迤西，骡马市大街南北两侧有多条南北走向的胡同，如南、北柳巷、魏染胡同、潘家胡同；铁鸟胡同、红线胡同、粉房琉璃街；东椿树胡同、四川营胡同、贾家胡同等。这里原是金中都东垣和护城河的所在地，其东北门施仁门，就在今魏染胡同南口；其东中门宣曜门，则在今南横东街潘家胡同南口。而菜市口西的烂缦胡同之所以呈南北走向，则是因为这里原是辽南京城的东墙和护城河的所在地。至于菜市口以北多条南北走向的街巷，如校场头条、二条、三条、四条、五条等，是因为这里曾是明代操练军士的校场所在地。

北京外城前门大街东西两侧的街巷、胡同虽没有内城的规整而且一反胡同呈东西走向的常态，呈现出西北-东南向、东北-西南或南北走向，然而，它们却记载下了北京城市发展的历程，是北京城市生命印记的重要组成部分。

已故考古学家徐莘芳先生曾经这样说过，如果你乘飞机在北京上空鸟瞰北京城时，你将会被宏伟的北京街道、胡同所震撼。正代表着北京旧城街道的风貌。大街胡同横平竖直、规规整整。

北京东西向平行的胡同，是总结了宋代以来开放式街巷制街道规划的产物。它是主干大道通往居住区的交通网络，快捷而便利。胡同路北的建筑物为面南正向，一座座封闭式四合院背风向阳，院内树木森荣，安祥幽静，互不干扰，街巷胡同和院落和谐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不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



“宜居”吗！它充分说明北京的胡同和院落，是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的。它是我国古代都城规划建设史上一个完全成功的杰作。

习近平同志在视察北京时曾经明确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

我们一定要遵照习近平同志的指示，审视古都北京遗存的这些历史文化遗珍，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阅并引用了徐莘芳先生一些研究成果，谨致谢意）

藕芽胡同7号老宅院的砖雕、木雕艺术

□ 李明德

北京砖雕技艺历史悠久，自清代康熙、乾隆时期京城四合院和寺庙建筑上的砖雕装饰，更加盛行。广亮大门门楼，如意门门楼建筑在钹檐、门头(又称“门额”)位置设计上，宅主人更愿展示自己的意愿。雕刻的图案更有寓意，在工匠的技艺上要求也更高。在特制的砖上，运用刻刀和技艺，将画面图案达到玲珑剔透的成品。真可谓是砖雕艺术应用到宅第门楼的鼎盛时期了。呈现出“福在眼前”“福寿锦长”“鹤鹿同春”“梅兰竹菊”“八仙过海”“竹林七贤”“佛八宝”……，传说人物、神话故事、花卉、走兽、博古，题材丰富多彩，大部分的富户和文人之家，都愿通过门楼上的砖雕艺术，展示出对文化、民俗、吉祥、平安的寓意和心愿。宅院内、外的影壁建筑上，增添了雕刻的文字，如“吉祥、平安、鸿禧、迪吉、迎祥”等。中心砖雕花样更多，如“九世同居、莲花牡丹、岁寒三友”等图案，更是将主人的心愿和风水学相结合，恰到好处。这一时期京派的砖雕工匠涌现出大量的高手，他们以此手艺养家糊口形成了专业的一行，民间俗称为：“雕花儿匠”。到了民国时期，尤其是民国初年开始，在四合院和一些商铺建筑上，砖雕又形成了长达几十年的发达兴盛高峰期。一些居民百姓住宅小型门楼的门头也都重视砖雕图案的展示，这也证实了居民们对胡同文化和民俗的重视，对生活中求太平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里要提的是位于护国寺老街上路北的一条短胡同，名为藕芽胡同(其位置在今天的护国寺小吃店东边)，老巷内路西有个坐西朝东的如意门门楼的清代老宅院(现为7号)，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传说是清代道光年间季姓官员的府第。此宅院是座有着二百余年历史的典型二进四合院。至今保存完好里院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院内种有枣树、葡萄、茶花木，这是宅主人

所住的正院。老北京有句俚语“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生动地道出了住在四合院里富贵人家的生活情境。去外院要经过垂花门。这正是主人的女孩子只能走到垂花门往外看，就不能再到大街门了，所谓的“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此院的垂花门展示出全木雕的建筑艺术。其古建精细壮观，尤其是门头部分，全部是透雕的朵朵梅花达200余朵，真可谓是清代木雕的珍品。

外院是主人的书房及门房，东南角

即是大门。这是一座清代古建如意门。其门楼坐西朝东，整个古建均为砖雕，尤其是门楼上的门额全部砖雕的花卉图案，大朵的富贵牡丹，左右还雕有精美花篮。中间的三组多宝阁，均为透雕画面，是古代工匠高超的技艺。虽经百年风雨，今天仍完好无损实为难得，是清代砖雕的艺术精品。对面的砖雕影壁整体建筑完好，磨砖对缝，四角花卉雕工精美。在京城老胡同中罕见难寻。这座老宅院的如意门、影壁及垂花门的古建和砖雕、木雕艺术的独特，时常会引来中外旅游者到此拍照。这座清代老宅院，近年已被定为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铁肩担道义 信仰铸党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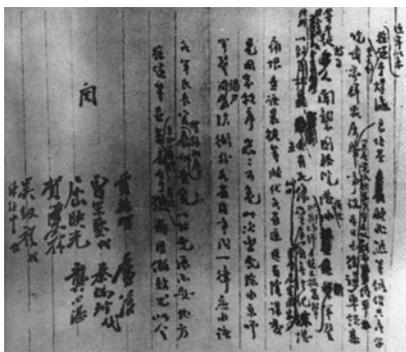
——革命先驱李大钊就义前后

□ 孙良菊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0年10月，他发起创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4月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时年38岁。

坚持战斗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方政治形势日益恶化，李大钊一直受到北京政府通缉。为了避免遭受敌



1926年3月19日，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贾德耀等署名签发了对李大钊等革命者的通缉令

人迫害，1926年3月底，李大钊带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以及一家老小，搬进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里，继续领导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按照《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警不得擅自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尤其不能携带枪械进入，这里应该是安全的。

但许多军阀密探和帝国主义间谍千方百计进行侦察。苏联大使馆门口总是停放着几辆洋车，一些密探伪装成洋车工，大使馆有人出来就被跟踪，直至逮捕。面对越来越险恶的形势，党组织和战友们都劝他离开，但他认为北京还有不少重要工作要做，坚持留下来继续战斗。后来，李大钊曾对夫人赵纫兰说：“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



反动军警严密监视苏联大使馆门口

候，这里的工作是这样的，哪里能离开呢？”奉系军阀在确认李大钊和国共两党领导机关迁入苏联大使馆后，即派京师警察厅侦缉队严密监视，派暗探化装打入内部，侦察各重要领导人所住房间号码，绘制成图。直到1927年4月初，敌人基本摸清了情况，随时有可能展开大逮捕。在这最后一刻，李大钊还有脱身机会，但他选择了坚守。

选择坚守

1927年4月4日，中共秘密党员杨度从北洋军阀政府官员汪大燮口中得知张作霖已决定包围苏联大使馆兵营，

逮捕中共地下党员的消息。当晚，杨度通知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



苏联大使馆西院旧兵营里中共北方区委的办公地址

（中共秘密党员），要他转告中共组织立即撤离险境。

李大钊得知消息后，也意识到了危险。他设法送走了一大批同志，留下来的都是自愿不走的，还做了焚毁机密文件、练习打枪等一系列的应变准备。据他的长女李星华的回忆：“在那些

日子里，父亲格外忙，他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早晨我们还没醒来他又离开了房间。有时候他也留在家，埋头整理一些书籍和文件。我们住的那座院落后面，有一个僻静的小院子。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在那里生起一个小火炉，一叠叠的文件被父亲扔进熊熊的炉火中。我常常蹲在旁边呆呆地看着。父亲的脸上显得十分严肃。我问父亲：

‘爹！为什么把它们烧掉呢？怪可惜的。’父亲没有立刻回答我的问题，过了一会儿才说：‘不要它们了，就烧掉。你孩子家，不要管这些事。’”他的好友章士钊几十年后回忆：“盖共产党之萃集俄使馆者，约百三十余人，守常闻讯，遣去百许，独二十余人坚守不动。”

他的坚守，正像他倡导的一种精神：“我们的目的，在废除人类间的阶级，在灭绝人类间的僭擅，但能达到这个目的，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辞。要知道，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

被捕入狱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在得到帝国主义与驻华公使团的默许和支持后，派出宪兵、军警等200多人，把东交民巷东、西、北三方围堵起来，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强行进入大使馆界内，袭击了苏联大使馆西院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等，对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人士进行大逮捕。

据李星华的回忆，那天上午母亲赵纫兰带炎华去散步，李大钊在里间屋里伏案工作，星华坐在外间看报。忽然听到一声枪响，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叫喊声，许多人从矮小的围堵上跳进院子

里。李大钊预感到有危险，镇定地从抽屉里取出那支闪亮的小手枪，带着星华躲进一间小屋。随着“不要放走一个！”的吼声，全副武装的宪兵、军警、便衣侦探蜂拥而入，用十几支枪口对着李大钊父女俩。一人冲上去夺了李大钊的枪。李大钊被绑带走，星华也被一同带走。

搜捕从上午一直进行到下午，逮捕了李大钊和他的妻子、两个女儿以及国共两党工作人员共80余人，同时搜去国共两党的大批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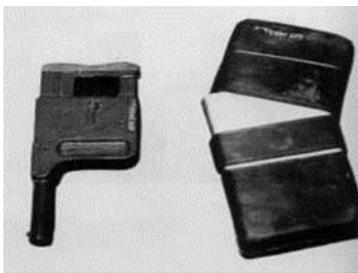
各方营救

李大钊等人被捕后，激起了北京及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北京的广大工人及教育界、新闻界一致奋起营救，坚决要求北京政府无条件释放李大钊等人。

4月9日，国立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等9校校长召开会议，商讨营救办法，公推北京大学校长余文灿、师范大学校长张贻惠为代表，于10日走访张学良，提出5点要求，其中有“李大钊系属文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军警包围苏联使馆，大肆逮捕革命者



李大钊使用的自卫手枪



军警搜查出的旗帜和文件



4月9日，北京国立九校校长开会讨论营救李大钊等的有关报道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12日，北京25所大学校长又开会讨论营救办法，决定发表书面声明，要求将李大钊案移交法庭办理。杨度利用曾在北洋政府任职的条件，会同梁士诒、罗文干于10日向张作霖提出“请将此案移交法庭裁判，依法办理……以彰公允”的建议。章士钊前往张作霖的亲信杨宇霆处商讨营救办法。河北乐亭同乡白眉初、李时等300多人联名上书陈情，请求军方保全李大钊的性命，并先行释放赵纫兰母子。北方铁路工人提出劫狱计划，并组织了劫狱队。李大钊得知消息后，极力反对这种冒险行动。他认为营救计划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不能再要同志们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中共北京组织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忍痛取消了劫狱营救。北方国民军向奉系军阀发出电报，提出警告。北平各报纸都以特字号登载李大钊乃是学者，大学教授，政治犯，不可伤害。苏联政府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并召回驻京代表，断绝外交关系。

但是，新旧军阀置强大的社会舆论于不顾，一意孤行，继续实施对李大钊



北京《晨报》关于苏联政府抗议中国军阀政府搜查苏联驻华使馆等的报道，以此为李大钊等呼吁

等人蓄谋已久的卑鄙谋害。

狱中斗争

李大钊被捕后，与奉系军阀展开勇敢机智的斗争，表现出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私无畏的英勇气概。在被捕当天的审讯中，李大钊“态度尚极镇静”。当审问他为什么要居住在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里时，“李答因与俄人有友谊关系，且喜该处清净云云。”在4月7日的第二次审讯中，他态度甚为从容，毫不惊慌，“俨然一共产主义领袖之气概”；“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极不知晓”。在此后多次审讯中，李大钊除对“共产学理及主义，均承认不讳”外，其他一概不知；对所谓种种“罪名”，“则竭力辩白，谓并无此项行动”。他“在狱中二十余日，绝不提家事。当他在审讯处最后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见到自己的妻子、女儿时，只静静地看着她们，没有对她们说一句话”。

他的这种无私无畏，来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信仰和对中华民族一定会独立，社会主义一定会在中国实现的信心，也来自他对人生的透彻看法。在敌人的严刑和利诱面前，他严守党的机密，始终坚贞不屈。他利用敌人让他“交代”的机会，写了《狱中自述》，回顾了自己革命的一生，表达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伟大抱负，慷慨直言：“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致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与此同时，他在两份供词中，几乎回答了审讯中提出的所有问题，但他的回答巧妙机智，既有敌人大体知晓的东西，又回避了具体的活动及组织接头的方式，正如有的报刊上所说：“李无确供”。



李大钊在狱中写的《狱中自述》

英勇就义

在上海“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发生不久，蒋介石即密电张作霖，“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张作霖不敢举行公开审判，而由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和京师警察厅组成军事法庭，进行所谓的“军法会审”。1927年4月28日上午，在京师警察厅南院大厅正式开庭，整个“会审”没超过70分钟，便仓促以“意图扰乱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宣判后立即执行。下午，李大钊等被秘密押至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执行绞刑。李大钊首登绞刑台，“神色未变，从容就死”。时年仅38岁。对于李大钊临刑前的情形，有多种说法。李大钊殉难第二天，向以“要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出名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牺牲

的《世界日报》以《李大钊等二十人昨被绞决》为题报道了绞刑经过：“未几执行吏来，首以李大钊送往绞刑台。李见此，知己不免，乃曰：‘请以纸笔来，俟书一遗嘱。’执行者曰，此时已晚，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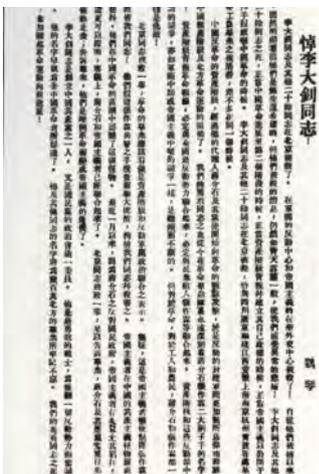
不得汝矣。李无言，神色尚未变，既上。执行者令其颈稍伸长，李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二十分钟始绝。”

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李大钊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早在《牺牲》一文中他就这样说过：“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李大钊等牺牲后被警方装殓在薄棺之中，寄厝宣武门外下斜街长椿寺内，派警察看守。当晚，赵纫兰母女3人被释放回家。直至第二天早晨看到报纸时，她们才知道自己的亲人已被绞杀。这一噩耗使李夫人“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然而，反动当局并未善罢甘休，仍继续派人进行监视。至5月



北京《晨报》、汉口《民国日报》报道军阀政府杀害李大钊等革命者的消息



李大钊遗体停厝处——浙寺东房

中旬，在李大钊生前好友的帮助下，她们才离京，回乡度日。

李大钊英勇牺牲的噩耗传出，全党为之哀悼。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发表悼念文章，称李大钊是“最勇敢的战士”，他的名字将为群众“牢记不忘”。中共北京地

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发表悼念文章

下党员散发传单，号召工友、商人、市民们别丧气，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许多受到李大钊教育影响的青年，在他的精神激励下，继承他的遗志，加入到革命的行列中。5月16日，中共中央及中共湖北区委在汉口举行万人追悼大会。党中央决定派专人北上料理李大钊丧事及一切善后事宜。

移棺浙寺

李大钊被杀害的消息传出之后，他生前好友梁漱溟、白眉初、李采言、李凌斗等纷纷前往探望家属，并到长椿寺准备领出李大钊棺木。在征求了赵纫兰的意见后，决定为李大钊换棺，并募捐办理后事。李凌斗找到德昌杠房的掌柜伊寿山，讲明要购买棺材重新装殓李大钊遗体。伊寿山推荐了一口标价260块大洋的柏木棺材，因为价格太高，李凌斗说明情况，请求伊寿山降价。伊寿山出于对李大钊人格的钦佩，只要了140块大洋，这已是北京城破天荒的举动了。伊寿山又请师傅用了20多斤松香和桐油熬在一起，用十几斤黑生大漆，里里外外给棺木上了五道漆。正是因为经过这样精心的打造，1983年党中央将李大钊的棺柩移至李大钊烈士陵园时，棺木出土完好，李大钊的遗骸得到较好的保护。

5月1日上午，伊寿山带领16名工人扛着棺材

到达宣武门外长椿寺，重新装殓李大钊遗体。杠房用药水洗擦遗体，穿上九层寿衣，头戴帽

子，脚穿鞋，安置妥帖，转入新棺，又用漆封上口。在场诸人，无不含泪悲愤，李星华、李炎华更是大声哭喊着爸爸，扶父亲入新棺，再三祭拜。11时左右，又由24人抬着李大钊的新棺到妙光阁浙寺，暂厝浙寺，安放祭拜。寺主人因李大钊为政府绞刑不愿收留，经多方疏通，才允许暂时停放，租费为每月四元，先预付3月费用。可没想到的是，由于当时北京白色恐怖严重，灵柩一放就是6年。

公祭公葬

1933年4月初，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偕子女专程来到北平与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系，准备料理李大钊的后事。中共河北省委、中共北平市委研究决定为李大钊烈士举行隆重公葬，并通过盛大的殡葬仪式来揭露反动派杀害共产党人的罪行，伸张革命正义，进一步唤起民众。为了使公葬活动顺利进行，党组织决定按民间风俗办丧事，具体工作由北平革命互济会负责。

根据党组织的意见，互济会即积极组织开展公祭活动的各项筹备工作，如制作中共党旗，刻制石碑，印制李大钊传略、遗像和同时就义的烈士简历等宣传品，置办挽联、花圈，雇佣杠夫、执事、和尚、道士、吹鼓手等，并在各界开展募捐和宣传活动。北平地下党员、团员、革命青年，李大钊生前友好及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款资助。捐款的知名人士有鲁迅、范文澜、

黄松龄、李四光、蒋梦麟、胡适、钱玄同等数十人。上海各革命团体也寄钱资助。北大校长蒋梦麟亲自出面在万安公墓为李大钊购置了墓地。筹备工作就绪后，由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出面，在北平《晨报》上登出讣告：4月22日在妙光阁毗卢殿举行公祭，23日举行公葬。

4月22日，毗卢殿灵堂，正中安放着李大钊烈士的灵柩和遗像，四周摆放着李大钊生前好友数十幅挽幛和数十个花圈。赵纫兰偕子女含泪守灵。李大钊生前好友、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和团体纷纷前往祭奠。

4月23日早晨5时，浙寺已汇集了2000多名送殡的群众，有教授、教员、学生、工人、农民、士兵和市民，其中有许多人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他们胸前佩戴着白色或蓝色的纸花，左臂上缠着黑纱。6时，灵堂里奏起了哀乐，人们陆续到灵前默哀致敬。随后，由十几名杠夫将一口深红的棺材从灵堂里抬了出来，平稳地安排放在绣着蓝白花朵的红缎子棺罩里。送殡的人们啜泣着唱起了哀歌和国际歌，高呼着“李大钊精神不死！”“为先烈报仇！”等口号，缓缓地离开了浙寺。长长的群众送殡队伍，高举着数十幅挽联和挽幛，抬着数十个花圈，尾随在灵柩后面。北平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送的挽联写到：“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

送葬队伍由浙寺出发，沿途高喊着口号，散放着传单，许多人主动加入送殡队伍，声势越来越高。队伍到达西单牌楼处举行公祭，宣读祭文，谴责蒋介石勾结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的罪行，号召广大市民团结起来，为先烈报仇，打倒国民党，武装抗日，收复失地；到缸瓦市，李大钊的灵柩上被覆盖上了一面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这给了反动当局施加镇压的借口。当队



李大钊烈士陵园

伍行至西四牌楼举行公祭时，国民党北平当局派出大批宪警向送殡队伍扑来。他们踢翻祭桌，抢走灵柩上党旗，四处抓人、打人。送殡队伍被冲散。宪警捕走40余人，没敢阻拦灵车。剩下的送殡队伍继续出西直门前往香山万安公墓。灵车行至西郊燕园（今北京大学）西门时，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又拦路进行了郊祭。

傍晚，送殡队伍到达香山万安公墓，一辆骡车已在恭候。车上放着一块石碑，碑首刻五星及黑色的镰刀斧头，正面是“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几个红色大字，背面是红字碑文，铭志李大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忠实最坚决的信徒……但由于当时环境险恶，只好将墓碑同棺柩一起埋入墓穴，直到1983年为李大钊烈士修建陵园时，这块墓碑才重见天日，被安放在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里。

1983年10月29日，在李大钊诞辰94周年之际，中共中央隆重举行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李大钊烈士陵园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接待国内外、党内外各界人士前来瞻仰。

李大钊用自己短暂的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他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他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我家四代人的启蒙母校马相胡同小学

□ 王建民

走进西直门内大街马相胡同不远，就会看到胡同东侧的一所小学——“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玉桃园分校”，现在我的大孙子就在这所学校里上学。

这所学校现有70多名教职工，近30个教学班，占地近万平方米，并且拥有一座配备较先进教学设备的五层教学楼及200米跑道的露天操场。据了解先后有西直门一小、二小、后桃园、三条、七条、新街口、东教场等7所老旧小学合并到这所学校。给人一种感觉，这一定是所条件不错的新建学校。

可很少有人知道，这所学校的前身竟坐落在一所破庙里。我在此校上学时学校只有5间课桌破旧的教室、20几名教师，10个半日制教学班，俗称“老爷庙小学”。

学校的巨大变化令人感慨！可让大家鲜为人知的是——历经风雨洗礼、岁月磨砺，跨越了近一个世纪的马相小学，还是我家祖辈四代人的启蒙母校（我家祖辈共有12人都曾为马相学子），我本人是我家第二代马相学子。现阔别母校50多年了，回想起来，真可谓往事如烟呀！

一、回忆在马相小学时的欢乐童年

我出生在马相小学西侧的桦皮厂胡同，从记事起，看着胡同邻居家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背着书包从家门前而过，我的哥姐们自由地出入家门（当时家长管得严，没上学前没有大人带领不允许走出街门），真让我羡慕，经常想：“什么时候我也能走出家门去上学呀！”

7岁了，可盼到上学年龄了，录取我的学校也和自己的哥姐们一个样——“马相胡同小学”，能和我的哥姐们在一起上学，更是让我高兴万分！

快开学了，全家人都为我忙乎着。父母给我买了在学校喝水用的搪瓷小水碗，及学校要求备的小

手绢、口罩，另外我还特别挑选了一个印有不能喝生水图案的铁皮铅笔盒，姐姐还从她的百宝箱（鞋盒）里拿出了一大把从北草厂口“西万庆文具店”买来的论斤称的铅笔，让我从中挑选，然后又一根根地削好。连比我只大一岁多的哥哥也将他一年级用的小石板和自制板擦送给了我。但是让我不高兴的是，父母竟让我背姐姐淘汰下来的旧书包，看着有了补丁的旧书包，我哭了！奶奶看透了我的心思，立即去桦皮厂口的“荣茂百货店”买来一条羊肚儿毛巾，不一会儿就用毛巾为我缝了一个新书兜，奶奶还找出来一块白布，为我缝了水碗套和装早点用的布袋。

1955年9月1日，我背着奶奶缝制的新书兜，高高兴兴地踏进了马相小学的校门。

居住在西直门的老住户，都知道马相小学的老师年纪大的多，有学历的年轻的很少，学校环境也不好，可以说是又小又破。

“别看老爷庙先生老，这里的先生教得好。”

“别看老爷庙小又破，教出的学生都不错。”

（每年毕业生只有一二个班，可年年都有考生考入四中、三中、十三中及女三中、女六中等周边名校）

这当时流传的顺口溜，就是这所学校的真实写照，这也是大多数学生家长看中这所学校的原因。我一进校门，迎接我们的就是一位50多岁的老教师——石老师。他不但是我们的班主任，还教我们语文、珠算、大字课，也就是这位石老师把我从初小一年级送到高小，在教过我的小学老师中，石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他对学生们管教得很严，淘气的孩子们都说他厉害。的确，他曾用粉笔头、教鞭击点过学生，有时还掐着淘气孩子的胳膊，将他

们推出教室。淘气的学生们背地里叫他“石老头子”，可我特别尊敬他，他也从来没对我“动过手”。石老师就住在学校附近的五根檩胡同10号（就是现在学校操场的位置），他经常带我们一些同学去他家玩。在学校里，我虽然不是“一分二分我常得”的差学生，但也比“三分我念弥陀佛”的中下游学生强不了多少！父母常为我的学习成绩着急，可石老师家访时总是安慰家长，不要恨铁不成钢，还不止一次地讲：“男孩子在这个年龄段比女孩子功课差是正常的，您等着进入高年级，学习成绩一定会赶上来的……”说的父母眉开眼笑，我听后也自然会更加高兴，从此也更加喜欢和尊敬石老师，对他布置的任务说一不二。

例如1958年，我上三年级，那是个大跃进时代，国家提出全民炼钢。为完成全国年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为响应号召，学校在院子西南角，也建造了一座炼钢小土炉。石老师动员学生们捐献废钢铁，我第一个积极响应，奶奶劈柴火的砍刀、火筷子、火钩子，都让我捐献了。虽惹得奶奶很生气，可自己仍不满足，又从城外建国轧钢厂找到不少车床铁屑，为了把这些铁刨花背回去，我将衣服脱下，兜上铁屑送到学校，可一抖搂衣服傻眼了，衣服油痕斑斑不说，还扎了许多小眼儿。简直像窗纱了！我站在教室外台阶上哭了，还是石老师亲自送我回的家，使我免遭了家人的斥责。我劲头更足了，第二天又领着同学和石老师一起，足足拉回了一车铁屑，由于校门窄（不夸张地说，当时校门还没有现在的屋门宽），三轮车进不去，我们就一点一点地抱，足足忙乎了半天，才将这些扎手的铁屑送到了学校的炼钢炉旁。当时我拿着“炼钢小将士”的奖状回家时，全家人都乐开了花！

二、怀念启蒙老师，寻踪母校历史

我在马相小学上完了初小、高小，整整6年的校园生活让我对母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那么的留恋，尤其是退休赋闲在家后，我时不时地就会想起童年时的快乐时光，自然也就联想到自己的童年母校和记忆中的那些慈祥而又威严的老师。经多方打听寻找，我于2015年6月寻找到了我在校学习

时的第一位老师——教导主任祝福州，几十年没见了，会面时没想到祝老师还是认出我来，他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那天我与祝老师聊得很久，他掰着手指向我谈及着一些老师的名字及部分老师的近况，他们是我的班主任石庆熙老师、校长冯靖、周虹及老师贾振华、陶英俊、陈玉茹、赵静宜、朱壁清、朝佩珍、孟昭仁等。可这些老师有一多半已不在人世了，尤其提到班主任石老师，他早在文革期间就受迫害致死……。祝老师观察到我凝重的表情后，立刻转了话题，提及了一件让现在人听起来都觉得非常滑稽可笑的往事来。一次上音乐课，学校唯一的一架脚踏老旧风琴的踏板带掉了，祝老师闻讯后提着工具箱赶来钉踏板。几个胆子大的同学见到工具箱的钉子后，就自作主张地拿出书包里的小锤，修起课桌椅来（注：当时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为西直门糕点厂砸核桃，每个学生都配备一把小锤儿）。祝老师非但不制止，还当起了学生的技术指导。这样其他同学也效仿着钉起来，还有的同学钉起破损的门窗来。回忆起当时这堂叮叮当当的特殊音乐课。祝老师对此事意味深长地说：“……这是一种精神，虽说现在条件环境变了，时代不同了，我觉得这种精神还应发扬不能丢！”

多么令人难忘的一次会面。可让我没想到的是，会面不到一年，就在2016年5月祝老师就与世长辞了，这更促使我加快了寻踪的步伐。

2016年8月，我来到了冯靖校长的家，87岁的冯校长热情地接待了我，当我把收藏的盖有冯校长大印的毕业证书给她看时，她高兴地忙叫自己的孙子给这张1954年的毕业证书拍了珍藏照。冯校长讲：1950年19岁的她，刚从专业学校毕业就来到了缺少年轻教师的马相小学，由于她学历高表现好，很快就被众多老师推举接任校长职务，使她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马相小学的第二任校长。冯校长说：“第一任校长叫杨学赢，是当时的北平市人民政府教育局派来的临时校长。第三任校长叫郝淑英，担任时间也不长，就由部队转业下来的周虹接任了，周虹成为了第四任校长。”我1961年毕业签发毕业证的就是这位周虹校长。当冯校长问及我对她当

时的印象时，我说：“您虽然个子不高，但长得秀气。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发现问题配合班主任，直接找学生谈话，该批评的就批评，绝不含糊。可有时又像大姐姐一样，和学生们一起玩、一起乐。”

对冯校长的评价，实际上是我大姐的看法，我大姐受冯校长教诲4年，她于1948年9月进入“老爷庙小学”。之后北平刚刚解放，她目睹了北平市人民政府教育局接管学校时的情形，她还是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呢！我大姐回忆说：“刚入学时，学校只有十几名教师，上学时是从学校南边的庙山门进入学校，要穿过两层坐北朝南的大殿，在第三层院里的配殿上课。前边两层大殿里供着不少佛像，香火很旺，有不少人来进香拜佛。每次路过时，学生们都要看看‘热闹’。”

到我（1955年-1961年在校）和我哥（1953年-1959年在校）在学校学习时，第二层大殿就改成了教室。即：第二层大殿、第三层院东配殿、西配殿、最北面左配殿、右配殿，共5间教室，十个教学班了。在校学生已达四五百名了。

这时原来对着山门的第一层大殿前后大门都上了锁，贴有封条，第一层院的配殿已经成为住户，遂与学校分离开来。学校在第一层大殿后开了一个校门，学校最南端就是第一层大殿的后大门。记得一次我与哥哥班的同学们一起用逮季鸟（蝉）的马尾套伸进第一层大殿后大门窗户，套出不少镶在供案四周的蓝头发黄身子的小木佛雕来玩，受到老师的批评和家长的斥责。

关于母校解放以前的情况，只有现已过世在新华印刷厂退休的姑姑生前与我谈及过，她曾在“老爷庙”免费学习过两年。

姑姑讲：上世纪30年代，当时老爷庙腾出两间配殿，成立了“女子启蒙培训班”，后改为“补习学校”。从此开始成为了一所平民学校，听说学校由一家叫万字会的慈善机构办的，专收一些因家贫上不起学的失学儿童入学，免收一切费用。这些孩子们和富家子弟相比都非常珍惜上学机会，为人处事憨厚善良，先生交办的功课不折不扣地完成，每年的学考成绩高于周边的其他学校。姑姑还感叹的

对我说：“没有在‘老爷庙’的学习，我可能永远成为文盲了，更不可能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印刷工人”。

为了更深入探寻马相小学校舍的历史情况，我在朋友的帮助下查阅到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

在《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1928年，关帝庙坐落在内四区马香儿胡同7号，建于清同治元年，属私建家庙。庙面积2亩余，房屋22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庙主管理及信仰，庙内法物有泥像12位、铁磬、香炉、鼎、铁刀等28件，另有树5株、石碑1座。

1936年，关帝庙坐落内四区马相胡同7号，建于明成化十八年，清同治元年重修，属私家庙。不动产土地南北18丈，东西8丈，瓦房21间，灰房1间。管理和使用状况为殿房供佛，余房借予红十字会小学市立女子启蒙培训班，为校舍。庙内法物有神像39位、礼器15件。法器10件、铁刀1把，另有石碑1座、大小柏树3株、楸树4株、槐树1株。

1947年，北平市民政局进行第二次寺庙登记时，该庙管理人为陈金生，庙址为四区马相胡同7号，送表时间为2月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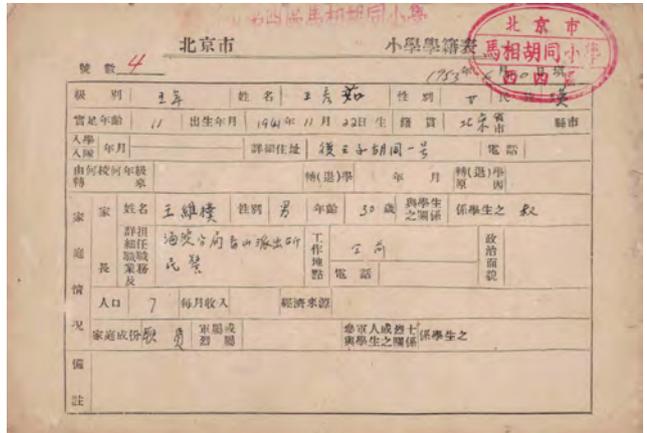
《北京西城文物史》有下列文字记载：位于马相胡同7号，建筑年代不详，坐北朝南，依次有山门1间。石门额上书“敕封三界伏魔大帝”。木额四件，木额“浩然正气”，署“大清同治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信士弟子众等公立”；木额“光天化日”，“署同治丁卯任寅月望日印务参领德山等及印务章京传禅等立”；木额“金阙至尊”，署“同治九年庚午十月谷旦正黄旗汉军都统阿克敦布敬书”；木额“文教昌明”“署同治九年庚午十月谷旦阿克敦布敬书”。大殿三间为吕祖殿，配殿五间为玉皇殿。

寻踪母校史之前我只浮浅地知道，我的母校解放前被居民称老爷庙小学，解放后其旧址改为马相胡同小学。90年代学校随地区危房改造，重新建校，又先后有7所老旧小学并入后改为玉桃园小学。于2014年又改名为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玉桃园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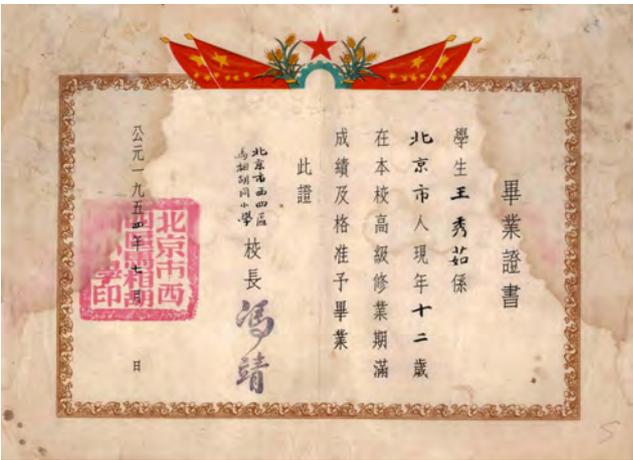
马相小学（老爷庙）原校址就在现五根檩胡同

往事追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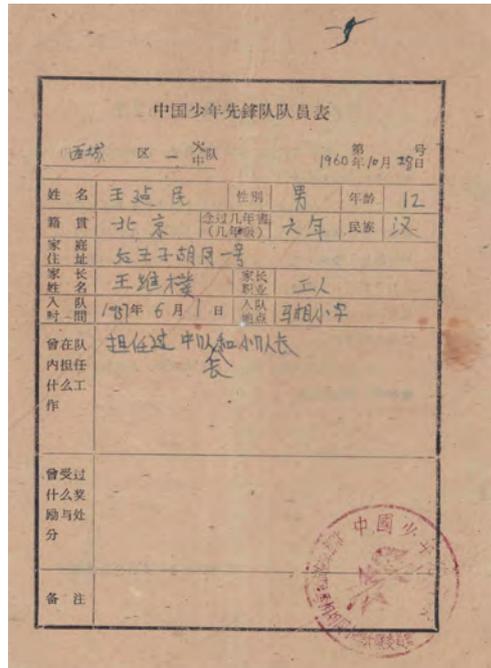
西口北侧的玉桃园三区9号楼的位置，原学校操场就在现教学楼位置。每当我路过这里时，我总是不知不觉地多看上两眼，并想起我可爱的启蒙母校——马相胡同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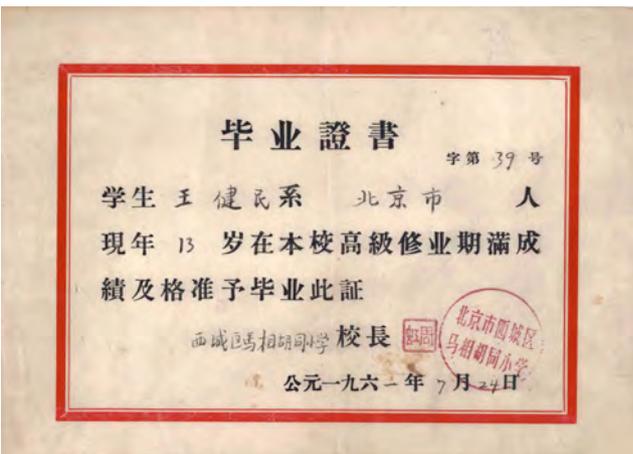
盖有椭圆形校印的1953年学籍表



盖有方形校印的1954年毕业证书



盖有学校少先队队印的队员登记表



盖有圆形校印的1961年毕业证书



1961年马相小学毕业班合影

翟鸿起先生仙逝周年祭

□ 高 巍

编者按：由于《西城追忆》，我们有幸结识了翟鸿起翟老，并结下了十几年的友情。翟老自幼在西城居住、上学和工作，对西城怀有深厚的感情。为表达这番感情，翟老十几年间，给《西城追忆》投稿，并刊登了《西单牌楼“栗子王”》《桃李园的“清音桌”和大通的默片》《直白的广告词》《记忆中的杨约翰牧师》《我在西城的少年时光》《西城影事》《市级文物老冰窖，现代冰温保鲜库》《锦什坊街玉馨楼和万安斋》《北京的灯谜社团》《杠业旧话》《老天桥的电影“院”和照像“馆”》《一场别致的清唱会》等十余篇文章。借高巍先生《翟鸿起先生仙逝周年祭》一文，共同告慰翟老在天之灵。

时近暮春，花红柳绿，景山公园的牡丹开得正艳——2017年的4月即将来临，望着月份牌，我忽然想起翟老去世已经快一年了！

去年的4月21日，我正远在湖北的宜昌远安县的嫫祖镇，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祭奠嫫祖的仪式。那天黄昏，刚刚回到县城的驻地，我正想躺下休息。这时手机的铃声响起，显示的是来自北京的号码。电话通后，只听见晓君兄低沉的声音：“老爷子于今天上午病逝”。

“翟先生没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一下子震懵了我，只觉得心脏一个劲地往下沉。晓君兄通知我说，老爷子留下遗愿，遗体捐献，明天上午举行告别仪式。听到这儿，我急忙表示，一定尽早赶回，见翟先生最后一面。放下电话，我半天无语，沉浸在沉痛的气氛里。

翟鸿起先生是我十分敬佩的一位长辈，他生前曾对我的工作和生活给予了亲切的关怀和支持。多年来，我已形成习惯，凡是工作上遇到困难时，常常都会指门请教，说说心里话。每当这时，翟先生

都会给予我充分的肯定和理解，提供具体的帮助和支持。

次日清晨，我辞去了参观三峡大坝的机会，独自来到宜昌机场，设法改签机票，未能如愿。此时，我来到候机大厅前的广场上，举目无亲，



翟鸿起先生

心焦如焚，恨不能插上翅膀立刻飞回京城，我仿佛看到告别仪式已经开始，翟先生安卧在鲜花丛中，接受众多亲友、学生和晚辈们的哀悼和诀别。我这时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给北京的亲友打电话请他们代我向翟先生致以最后的敬意。

我和翟先生结识，是在2002年的夏天。此前虽然早闻其大名，获悉他和常人春先生、方彪先生等在琉璃厂京味书楼的民俗讲座，并拜读了翟先生编写的《老北京的街头巷尾》一书，深为其语言的通俗生动，内容的亲切详实而留下良好的印象，但却一直未曾见面。

2002年夏天，中国民俗学会燕京民俗研究与开发专业委员会在东岳庙举行成立会议。时任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的刘魁立先生、副理事长王文宝先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贺学君女士亲自莅会，贺老师还宣读了中国民俗学会的相关决定。翟鸿起先生也参加了那次会议，并被选为第一届理事会成员。那是我和翟先生的第一次相见。他将自己的著作签名送我，并对专委会的成立表达了极大的兴趣和支

持。打那以后，翟先生和我成了忘年交，建立了亦师亦友的亲切友情。2003年春节前夕，我决定在门头沟的一家宾馆举办一次传统京味过除夕的活动。此决定一公布，就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反对。因为我缺乏从事这类活动的经验，没有足够的人脉，举行这样的活动就意味着难以成功。

当我把这一想法告诉常人春先生时，他依旧摇头，难以首肯。但是，当翟先生知道我的这一想法以后，却当即表示支持，并且主动参加。尽管当时考虑到翟先生住家较远，未能邀请，但他的这份支持使我获得了巨大的鼓舞。这份支持，伴我度过了专委会成立初期的摸索阶段，至今想起心中都充满感激之情。此后，但凡我组织的民俗活动，一旦向他提出邀请时，他都参加，没有一次拒绝。这当中，具有一定影响的活动有：2004年冬至在岳家花园举办的民间祭天仪式、2007年中元节在天寿陵园举办的祭奠仪式，以及在刘海胡同、恭俭胡同四合院中举办的祝寿堂会和节庆活动。2007年春天，在府右街宾馆，由我策划并主持的翟鸿起先生75周年寿辰暨收徒仪式，表达了我对翟先生的衷心祝福和谢忱。仪式当天，翟先生还邀请了他的学生张阔参加，老北京网的后辈们也送来了贺礼，出席活动的各位前辈、专家代表在贺幛上集体签名留念，表达了对翟先生的衷心祝贺和他多年从事民俗文化的传播、宣传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翟先生晚年虽然由于身体的原因参加这类活动的数量减少，但他的关心和支持依旧。每当我提出请他为相关活动制作灯谜时，他都满口答应，及时提供。

翟鸿起先生退休以后，专心致志从事灯谜事业，蜚声京都谜坛。仅是学苑出版社出版他的灯谜专著就有五六种之多。不用说在北京，就是在全国，其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数一数二的。其内容涉及灯谜制作、灯谜历史、逸闻趣事等方面的内容。翟先生从事灯谜事业既非科班，也不是师徒传授，而是完全出于他的喜爱。

翟先生出生于天津，少年时随父母来到北京，入百货批发行学徒。其老板为一基督徒，要求他们每天按时祷告，节假日参加相关活动。所以，尽管

翟先生并未入教，但是深受影响，从小养成了待人接物、生活起居方面的文明礼节和良好习惯。

“文革”后期，翟先生走上讲台成为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就这样，他凭借着参加工作之初养成的不怕苦、勤钻研的精神，以及教书期间积累的语文知识，投入到灯谜理论的研究和灯谜制作的实践当中，不断探索，持之以恒，克服困难，终于取得了事业的成功。他所取得的这些成就远远超乎了外人的预期，即便他的老领导、老同事也无不赞誉有加、惊叹不已。而这当中，所遭遇的冷落、孤独和挫折，翟先生却从未向人提起，而是深埋在自己的记忆底层。

最让笔者感动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东城区文化馆举办庙会以来，就聘请翟先生加盟，主持灯谜竞猜活动。前几年，市文化局组织春节庙会的评比工作，我受命从事城郊的庙会考察，每当来到东城区文化馆的庙会时，总会在二楼的图书阅览室内，见到翟先生忙碌的身影。他不厌其烦地向竞猜的人们解释灯谜的含义，或是传授解密灯谜的方法，为猜中的人们发放领奖票证，有时忙得嗓子沙哑、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更为可贵的是翟先生每年春节期间，都要来到这里从事猜谜的组织，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以这样的方式度过春节假期，这一坚持就是20多年，从未间断。这是怎样的献身精神、这该是对灯谜事业怎样的热爱呀！2006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开始，翟先生将他所爱的灯谜也参加了评审，结果未能通过。我劝翟先生多想开些，未通过并不等于灯谜没有价值，以后还应坚持下去。然而，此事在他老人家心中却久久难以释怀，他不愿让自己热爱的事业遭他人误解，以致后来很多年里，我建议他再次申报之际，都未及时得到他的回应。前年，这个项目终于在西城区申报成功，翟先生理所当然地成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圆了他多年的一个夙愿。自我与翟先生结识以来，但凡与灯谜有关的活动，只要邀请到他时，他都无不响应，积极参加，受到人们的欢迎。有一年，位于南四环的世界花卉大观园邀请他参加春节庙会的灯谜活动，而此时他早已搬到北五环外的天

通苑去住。活动期间，他坚持每天按时到园，按时离园，每天在现场坚持十几个小时，每天披星戴月两头见不着太阳。而此时翟先生已过古稀之年，每日奔波不辞劳苦。

翟先生是北京谜坛的泰斗级人物，而他的爱好所及却远不止于此。他曾将自己的相关爱好编成了四五本专辑出版，内容涉及商贾、灯谜、京戏、美食等多个领域。几年前，笔者曾亲身欣赏了翟先生参与表演的对口相声《黄鹤楼》。由此，发现了他在相声、曲艺领域的爱好，以及对京戏的热爱。特别是京戏，几乎是翟先生青年、中年时期的主要爱好。他曾经多次粉墨登场，扮演京戏中的角色，演出全本的京戏。

而且，翟先生还了解京剧界的逸闻掌故，以及许多戏出的内容和知识，这在其所著《老票说戏》都有详细记载。

每当朋友聚会，大家聊起京戏之际，翟先生总是滔滔不绝，如数家珍，神采飞扬，陶醉其中。尽管这当中的有些典故早已写入《老票说戏》一书当中，但他再次提起，依然那样入诗入画，体现出对京戏发自内心的热爱。刘嵩崑先生是京城首屈一指的京戏掌故名家，尤其专长于京戏流派家谱的研究，因此，翟先生与刘先生二老相会，京剧使他们如痴如醉，如入无人之境。

翟先生青中年时期，业余时间从事京戏的演出和学习，在同行当中，经常会举办京剧票友的艺术交流和实践活动，翟先生也参与其中，扮演旦角。上文提到的翟先生表演的相声《黄鹤楼》，就是以学唱为主的经典段子，表演之际，翟先生的唱段贯穿始终，其一招一式无不专长娴熟，唱腔和身段颇有韵味。翟先生晚年整理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京戏脸谱，为其一一做谜，成为京戏与灯谜有机结合的特色之作，也为灯谜创作打通了一条新路。

翟先生还经常以民俗专家的身份，在电台、电视台和庙会上讲民俗，并接受媒体采访，表达自己对一些民俗现象的看法。2005年春天，我应首都图书馆之邀，作关于春节习俗的讲座，我邀请常人春、翟鸿起两位老先生共同登台，回答听众们提出

的关于节日民俗的有关问题，民俗界的两位著名人物，同时出现在讲座现场，既是给予我这个晚辈的巨大支持，同时也为听众提出的问题做了权威的解答，一时传为佳话。几年前，首图为《乡土课堂》专门选用了两位前辈和我同台回答问题的照片。翟先生还把他的民俗知识和生活经历编入了他的《瞬间消失的胡同》一书中，让人们打开此书，仿佛可以生动的感受到那热情、温馨的人间真爱和乡土人情。当年此书出版之际，我专门为翟先生举办了一次该书的首发座谈会，邀请民俗界和文史界的各位前辈同仁，共同祝贺此书的出版。恭俭胡同冰窖小院餐厅的负责人对此项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我组织的众多民俗活动当中，翟先生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表现在许多方面，有的时候是请他出场站脚助威，有的时候是请他制作灯谜，有的时候是请他提出建议和指导，而有的时候则是请他亲自下厨制作吃食。2007年，在恭俭胡同的一座古老四合院里，我策划并主持了一场祭天的模拟演出，期间，我请常先生介绍冬至民俗，而请翟先生具体介绍消寒图，此外，他还接受了一项特殊的工作，为当天晚上的聚会包制馄饨。那天的夜晚，天气很冷，翟先生包制的馄饨一出锅，就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

多年来，翟先生以他对民俗文化的高度热情和专业的制谜技能、相关知识和生活经验，出入学校，来到公共场所，进入社区，甚至走入家庭，给予人们知识，带给人们欢乐，激发起人们对民俗文化的热爱和向往。他以自己的不懈努力，让人们感到民俗文化的无穷魅力和夺目光辉。如今，翟先生虽然已经驾鹤远行，然而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浮现在我们眼前，他的付出、他所取得的成果、他所具有的美好品德依然受到后人的敬仰和钦佩。他所未竟的事业后继有人，前程似锦。

今以此文告慰翟先生的在天之灵，并作为向翟先生仙逝周年的祭礼。

风雨二百载 酱菜誉京城 记风味独特的酱菜园——桂馨斋

□ 张宝堃

近年来，人们对北京老字号的兴趣越来越浓了。有人说，鹤年堂和甲骨文有关；六必居和酒坊有关；桂馨斋和“老佛爷”有关……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和历史事实有关。

我是桂馨斋的最后一代传人沈尚哲先生的姑爷。因此，我总想把我了解的情况告诉给大家，以期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上个世纪50年代，在“公私合营”的过程中，六必居和桂馨斋合并了。然而，实际上六必居和桂馨斋的酱菜并没有共同之处。桂馨斋之所以能存活至今，是因为它的酱菜和北方的不同。

六必居原来是酒坊，这并没有什么争议。可在社会上总流传着这样的一种说法：六必居的匾额是明朝嘉靖年的大学士严嵩题写的。但是，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身为大学士的严嵩，恐怕是不可能光顾的。而喝酒的店铺高低贵贱、行行业业的人都能去得。由此可见，“六必居”只能和酒有关。因为只有是酒坊，严嵩才可能去，才可能乘兴给店家题匾。有人曾煞费苦心去山西临汾考证，但也只核实出是酿酒还是卖酒，和开门七件事无关。所以，六必居还是对酒而言，和酱菜无有半毛钱的关系。

“六必”是一种精神，是存仁、存礼、存义三兄弟的精神。我们从1965年北京市市委书记邓拓的调查中可以看到，六必居出现的时间是清雍正六年（1729），店名为“源昇号”。地点和粮食店无关。

清乾隆元年（1776），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东侧，原骡马市大街路北铁门胡同口内，开了一家酱菜园子桂馨斋。

由于南方醇香又略带有点甜口的酱菜吸引了北京人，桂馨斋办得越来越红火，一天比一天名气大，很多人也开始做起了这一生意。据说，铁门胡同里有72眼井，做酱菜少不了井，每家把井都打在自己屋里，虽说有不少家经营酱菜，但挂出字号的却没有几家。什么兰馨斋、瑞馨斋……这个斋那个斋的，也有不挂牌卖酱菜的，不管数量有多少，但都没有桂馨斋办得好。

出于好奇，我经常问岳父一些有关桂馨斋的情况。岳父说，沈家的祖上在酱菜园子刚建时就是师傅的大徒弟。他还给我讲了桂馨斋的故事。

大概是在雍正年间，从南方来了一对夫妻。可刚到北京，他们是两眼一抹黑。北京的南城就是穷人区，好发展，干什么的都有。夫妇俩没有其他手艺，把自己在南方家里年年腌制的咸菜做一些在街上卖，还真有人认。后来在菜市口的大街上摆了个摊，酱菜的咸味加上甜香味和便宜的价钱，深受穷苦百姓的欢迎。而与“六必居”有不同味道的酱菜在京城一传十、十传百，知名度越来越高。不几年，风味酱菜传开啦！这个地摊卖的不是北京人平常吃的咸菜，因此招来了不少顾客，俩人的汗水终于没有白流。他们不只换来了养家糊口的钱，还有了富余。有点钱了，也就有了开店的想法。这才在铁门胡同内开了一家桂馨斋。

“桂”即桂花，别称木樨；用桂花编制而成的冠则称“桂冠”，所以又有“折桂”之说，取其清香高洁之意。“馨”是指芳香沁心悠远。另故人多把读书、藏书的地方称之为“斋”。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则称：“斋，戒也。”言下之意，“斋”乃是清心洁净之处，包含有一种恭敬、清雅的意思。用“桂馨斋”作酱菜园子的字号，颇显出几分高洁、儒雅之气，很得人们称道。

两口子在店里经营，起早贪黑，干得是风声水起，从租房到买房。在屋里还挖了口井，虽然门脸不大，两间房打扫得干净整洁，门市正中还挂了一块匾，是自制的黑底金字《桂馨斋》三个大字挺显眼，真挺精神的！岳父那得意的劲儿，像身临其境的一样：“咱们沈家的祖先，在200年前乾隆元年建铺子时就跟着师傅，是大徒弟。店前边柜台售货，开门营业，房后建一个手工作坊，加工制作，干得热火朝天，从此北京就多了一家和六必居味道不同的酱菜园子。

当年，从刚开业时起，师傅的要求就非常严格，要徒弟们精心挑选原料，制作工序一道也不可缺少。沈家的徒弟厚道，老实能干、心灵手巧，两口子膝下无子，便把徒弟当儿子一样看待，把自己的全部手艺都传给了沈大徒弟。真应了那句话：师徒如父子啊！从此，徒弟成了顶梁柱，他工作也更卖力，把店当成自己的家，把师傅、师娘当爹妈，师傅也把徒弟当亲儿子一样对待。徒弟照顾老两口的饮食起居，为师傅管理店铺和加工厂。

但老两口思乡心切，决定告老还乡，唯一不放心的就是南方风味酱菜。他们把一生的梦想托付给了沈家，沈家接过了酱菜产业，也明白师傅的心思。为了报答师傅就更加努力了，工作更积极了。要办好桂馨斋，就得记住师傅的话，保持原

来的口味。自从改换门庭后，一个南方酱菜园子正式由地地道道的北方人经营了。

岳父说，咱家祖祖辈辈是河北故城郑口人，和山东省的德州很近，性格、脾气耿直。咱家的祖先是跟着师傅在店里几十年，学徒干活，酱菜产品有多少道工序，记得是一清二楚。多少次采买都是师傅带着老祖亲自去的。在师傅口传心授下，既学会了手艺，还学会了做人。他们善良勤劳实诚，技术更成熟，全盘继承了南味酱菜的特点，做桂馨斋真正的继承人。由于坚持“精细”二字，质量风味不变，博得了更多的好评，桂馨斋的酱菜誉满京城。

沈家接手桂馨斋后，反复和徒弟强调“五不变”：精选原料不变，精工细作不变，南方口味不变，大众需求不变，便宜价格不变。并且在继承传统薄利多销，发扬名牌优势的同时，搬出“佛手疙瘩”“冬菜”“酱八宝”等一系列名品。沈家还提出新的主张，即学习六必居的经验，但禁止模仿，反对雷同，要别出心裁，花样翻新。沈老板的话牢记在徒弟心里，成了桂馨斋办店的至理名言。

沈家祖先经历了从乾隆到宣统清朝六个皇上，一个民国，200年的历史，搭上沈氏六七代人靠的是“诚信”。桂馨斋不只货好，规矩也多。沈家不允许设小掌柜的，没有少东家，不许“世袭”；对子女不特殊，不养吃闲饭的。为了全店利益，不给任何个人和店铺作保人，防止倾家荡产，让全店老少员工放心；无论是什么产品都要选最好的原料，最精湛的技术，最认真的态度，最合理的价格，最优质的服务。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不被人欺负，永远不会被打趴下。产品的味道必须要达标，不能差一点，这叫做自己的特色。正因为桂馨斋具有浓厚醇香的甜口特点，这就是与六必居的区别，这就是北京

人吃咸菜的空白。

桂馨斋的名品“佛手疙瘩”，也有人叫它“酱佛手”，这是它的镇店品牌，是著名的特色酱菜。它选料严格，即必须是北京南郊小红门生产的“二道眉的芥菜头”，且要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再经过“晾”“晒”“腌制”，要反复下料，再经过“蒸”“煮”“晾”“晒”“装坛”“发酵”反复9次，制出的产品才是合格的产品。因为原料芥菜头的尾部形状酷似“佛手果”，因此得名“九蒸佛手”。

“佛手疙瘩”的产品是酱紫色的，切开后断面上有光泽，拿手一摸，软软乎乎的，嚼在嘴里嘎嘣脆，甜味厚重，清香爽口。它甘咸适度，用它切丝和肉丝炒出的菜脆韧可口，虽登不上大雅之堂，也让老北京人赞不绝口，乃是一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美味佳肴。

桂馨斋从来没想发了大红穗子的一顶白帽超过谁，扳倒谁，就是要一块生存的地方，干自己的事，完成师傅心愿，报师恩，完成祖业。

后来，桂馨斋的酱菜传到了皇室，慈禧（西太后）御赐六品顶戴花翎，成为酱菜行业中炫耀的资本，一直珍藏在自己的卧室。因为受皇室的影响，达官显贵在请客时也少不了摆上一碟桂馨斋的酱菜，一是时兴，二是有与皇同享之荣耀。名声大噪，也就带来了不少生意。

在岳父的口中说起桂馨斋真是如数家珍。他总是自豪地说：“名气是吃出来的。”酱菜的名声先传到御膳房，他们说好吃，皇上娘娘就知道了。太监一上口，皇上一尝，柜上可就忙了。对外是光鲜照人、皇恩浩荡，带来了不少生意。但实际上是担惊受怕，一点儿差错都不能出。人命关天，出了事要砍头的。爱吃“佛手疙瘩”，天天送，天天盯着寸步不离啊！因为这个，宫里特颁发了一顶白帽子，还有一个大红穗子、一件黑

色的马褂和进出皇宫门的腰牌，面儿上为的是进出方便，实际上是怕耽误皇室吃酱菜。对外吹牛说皇室爱吃，有钱人也跟着吃，表示能吃皇宫喜爱的咸菜高贵。后来，在铁门胡同慈宁寺旁又盖了个大作坊。

光绪三十年（1904），又发展了“南桂馨斋”“桂馨栈”“桂馨东记”三个铺面房。1937年，我父亲又在北京宣武区大川淀胡同15号，就是后来的南横西街50号盖起了一个大的工厂，工人人数达到190多人，营业面积达6848平方米。全年的原料需求量也很可观，芥菜头100多万斤，大白菜150多万斤，其他瓜菜数量也大得惊人，可谓在京城首屈一指。1938年出版的一本《北京旅行指南》上，介绍了桂馨斋、全聚德、稻香村等老字号。其中以酱菜为内容的却是唯一的一家，说明在酱菜行业中，桂馨斋名列榜首是不争的事实。

我岳父总说：一个河北故城的沈氏家族的五代汉子，经营桂馨斋历经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代皇室（从1736-1912年）加上民国直到新中国成立，几代人的心血，为了一个承诺，为了南方夫妇的恩德，为了南味酱菜落户京城，付出了多少辛酸、多少苦难！

这真是：

桂毓江山分冀北，
馨盈易水胜江南，
酱裕周官百世瓮，
园留庄子八千年。

中轴线的记忆

□ 薛仲迪

我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对山的情感，始于美丽的景山公园。

景山是京城的最髙点，站在“万春亭”上远眺，京城的风物尽收眼底。

记得上小学时，我最盼望周六下午半天休息，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景山公园。

景山公园与众不同，园中有耸立的山峰，因此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常常与几个同学约好，各自带着“武器”——木制的刀和枪，穿过曲折的街巷，兴冲冲一路奔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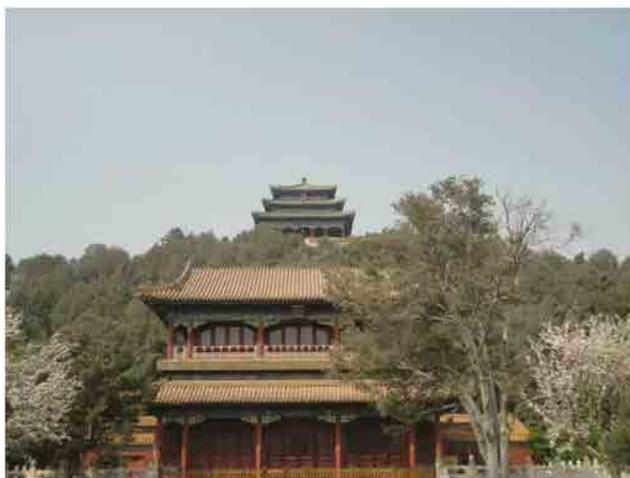
那时不知道什么中轴线，进门后一路狂奔，就如同出笼的鸟，尽情宣泄着内心的畅快。常玩的游戏是“官兵抓贼”，人分成两拨儿，一拨儿是“泼贼”，一拨儿是“官兵”，前边先跑，后边再追。

满山是稠密的树木，大多不高，其间有崎岖的山道，曲曲折折。在这林木小径之间，恣情的奔跑，少年的心激荡澎湃。玩一会儿有些累了，便“偃旗息鼓”，拖曳着“刀枪”，来到万春亭前休息。

景山上有五座亭子，沿着山脊对称排列，中间最高处是“万春亭”。春夏时节，站在山巅，清风徐来，身心俱爽。极目远眺，京城风光尽收眼底。

那时惊异的发现，北京城如此有序，如同一张大的棋盘。有一条清晰的线，由南至北贯穿着。

这是一片琉璃瓦的屋顶，依次排列的是：神武门，乾清宫，三大殿，午门，端门，天安门；再向南延伸是纪念碑，前门，一直延续到永定



门。

这格局威严、肃穆，又气势磅礴。山后的公园内，一组建筑是北京少年宫；出了门是景山后街，经过地安门路口，更远处则是钟鼓楼。在这线的两边，环绕着各种建筑。

围绕着紫禁城的，是宽阔的筒子河。绿色的河水，灰褐色的墙垣，错落的雉堞，岸边垂柳依依，显示出一种庄重的美。

那个时候，少年的心曾经陶醉，为了这不凡的景致，也因为惬意的感受；于是我对景山有了特殊的情感。

景山山后的少年宫，是孩子向往的地方。那有各种活动场所，还有一个标准的球场，在那里我们曾经试过脚。为了学习足球知识，老师带我们看录像。就在台阶上那间大殿里，我第一次看到足球录像。

在景山公园里，我参加过节日游园活动。那时能够参加游园活动，对我们来说可是不简单，是需要优中选优的。



有一年“五一”劳动节，我很有幸参与其中。身着白汗衫蓝裤子，颈上系上鲜艳的红领巾，手中高擎彩色花环，列好队站在甬道两边，欢迎来游园的内外宾客。

5月是天朗气清的日子，公园里处处花香鸟语，喇叭里播放着轻音乐，整个气氛轻松而又热烈。

在来往的宾客中，记忆深刻的是徐特立。老人拄着一支拐杖，一把胡须完全斑白。当有人认出徐特立，我们立即兴奋起来，舞动手中的花束表示内心的敬意。因为那时我们都知道，他可是毛泽东的老师。

十分有趣的是，来宾中竟有同学的身影，那是同班里的高知子女。想想昨日还同窗共读，换个场合就身份各异，真是挺有趣的。

记得小时候，我家的外屋墙上，挂着一个镜框，是一张摄影图片，照的是天安门：旭日东升，阳光普照，色彩极为热烈，充满勃勃生机。那是谁的摄影作品，我倒没留意过。但配诗的作者袁鹰，却记忆是很深刻的。

天安门是北京的中心，正好坐落在中轴线上。这里有全世界最大的广场，就在这广场周边，发生过许多重要历史事件。比如：“五四”爱国运动，庆祝开国大典，“文革”时检阅红卫兵，“四五”运动等等。我参加过的有：国庆节的组字活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悼念敬爱的周



总理。

1964年10月1日，我第一次参加国庆组字。早晨天未亮整队出发，到广场时天气还尚早。

那一天，人人身着节日的盛装，四边到处是彩旗招展，广场回荡着激昂的旋律。9点庆典正式开始，有领导人讲话，有礼炮的轰鸣，有鸽子的放飞，有游行队伍的行进。第一次参加大型活动，感觉场面隆重热烈，仿佛置身在洪流之中。

我们的任务是举花组字，将三束不同颜色的纸花，按旗语的信号轮番举起，从而形成各种口号标语。效果自己看不到，组的什么字，我们也全不知道。但站在高处，天安门城楼上的人，却一目了然。即使如此，我们也不敢马虎，因为是政治任务，就得格外小心，做到步调一致，不敢出一点点差错。

早晨秋凉渐起，中午天气燥热，凉热之间不好受，但大家没有抱怨。活动已接近尾声。有一项特别的安排，组字少年舞动鲜花，一起涌向天安门城楼前，隔金水桥仰头高声欢呼，高呼领袖毛主席万岁。那时心情十分激动，看到主席的身影，觉得自己无比幸福。

参加第二次广场组字，已是一九六六年国庆。那时“文革”风云骤起，气氛就有所不同了。实际上是接见红卫兵，连同国庆节一并举行。领导人的讲话过后，没有什么隆重庆典，只有各地串联学生，高呼口号步行而过。那正



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还有1976年的“四五”运动，那时我也曾经到场，感受何为“民心不可欺”，何为“于无声处听惊雷”。

广场记忆不是都激烈，也有很为温馨的时候。比如春意盎然的日子，在广场上放飞风筝，是非常惬意的事情。一碧如洗的空中，几丝轻柔的云缕，许许多多的风筝，在提线的牵引下，在空中徜徉遨游。其中有沙燕，有蝴蝶，有雏鹰，有蜈蚣，也有简单的“豆腐块”。那是一道极美的风景。

顺带想起春日养蚕的事。那时要索取蚕种，要拿着学校证明，到前门附近的纺织公司领取。下午放学后，大家兴冲冲地出发，穿街走巷直奔前门。领到几张密布蚕种的纸，然后边说边笑着往回赶。回程穿过天安门广场，不经意间，天上飘起细细的雨丝。宏大的广场上少有行人，地上是清浅的水洼，晶莹的，润润的，雨滴无声地飘落，激起小小的涟漪。

出景山向北走，先是景山后街，两边是大屋顶的建筑，整整齐齐地左右相对，据说这是部队的什么机关。

再向前走不远，过地安门路口，再向前走就是鼓楼。途中有一石桥，俗称“后门桥”。桥身早已斑驳残破，积满了历史的遗迹。桥下一道清流，向东若隐若现，流向却不知所终；西边水势开阔，那便是什刹海，是休闲的好去处。

鼓楼前边地方局促，形似一个三角地带。因为周边多是民居，鼓楼越发显得挺拔。想想几百年以来，这里的晨钟暮鼓，送走了春花秋月，迎来了古往今来，见证了多少兴亡更替，不由不感慨油然而生。

我来鼓楼时候不多，毕竟生活在西半城，很难得到这来一次。上小学时，有一位同学家住在鼓楼，借到他家来玩耍的机会，才顺带了解这里的街市。

同学家住在方砖厂胡同。那是一处不标准的院落，院门很小也不起眼，但是进去后才发现，院子其实很大，房子也很宽敞。一院子的花草草，从甬道旁到台阶边，甚至正房的窗台上，到处都摆满了盆花。整个院落被绿色覆盖着，显示出主人的情趣。

院子里东西厢房前边，各有一架繁茂的葡萄，一个是玫瑰香，一个是马奶子。两架葡萄之间，地上植有两簇牡丹。牡丹可是国色天香，看上去叶子墨绿，枝干粗壮，透着一种富贵气息。正是五月天，有含苞待放的花，有昂首怒放的花，颜色深浅不一，粉白夹带姹紫，花瓣层层叠叠，花心纤巧秀气，真有巧夺天工之意趣。

同学作为向导，为我介绍起花草来。他家是独院独门，环境幽雅而静谧。在医院工作的父亲，是位酷爱养花的人；不仅养花，还养鸽子。因为富有文化素养，所以小院格调不凡。

那一天临走时，他择了一些花送我。又从屋里拿来剪刀，从牡丹中挑选大花，小心翼翼剪下一支，插在一个水瓶当中，看着我中手擎花瓶，目送我骑着车离去。

许多年后，往事还能隐约记得，围绕中轴线的回忆，常常还会浮上心头。这该是情之所钟吧。

李大钊在西城石驸马后宅的岁月

□ 康广云



故居内李大钊塑像

传播时代精华的伟人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1913年北洋法政大学毕业后，李大钊即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曾参加过反对袁世凯运动。1916年回国，后任北京《晨钟报》总编、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和《新青年》杂志编辑。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热情歌颂十月革命，是我国最早介绍和颂扬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

同年11月，李大钊在北京学界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集会上进行演讲，这篇演讲稿经过整理后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第五卷第5号上，这就是著名的《庶民的胜利》。李大钊认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的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5、6号上连载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上三篇文章的发表，不仅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李大钊自题：“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表示要用钢铁般的肩膀承担正义的事业，用巧妙的笔墨书写激励人心的文章。他把“妙手”作为自己战斗的誓言，以犀利的笔锋撰写文章，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思想论战。

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仅批驳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错误主张，而且驳斥了“实业救国”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的提法。李大钊指出：中国必须发展实业，但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建立共产党组织。经过思想论战，李大钊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种种错误思想，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是那个时代乃至当今时代的先进思想和时代精华，李大钊是传播和弘扬先进思想和时代精华的一位时代伟人。

充满和谐、激情的故居

1920年春，李大钊一家迁居石驸马后宅35号（今文华胡同24号）。文华胡同位于北京西城区，东起佟麟阁路，西至闹市口中街，中有岔道北通文



故居内北房大厅摆设

昌胡同。清乾隆年间称为石驸马后闸，宣统年间称石驸马后宅，简称后宅胡同。1965年，更名为文华胡同至今。

李大钊在1920年春至1924年1月，居住在石驸马后宅35号（今文华胡同24号）。该院共13间房，正房三间，东西耳房各两间。北房东屋为李大钊夫妇的卧室；北房堂屋和西屋为餐厅、接待室及全家人活动场所；西耳房为李大钊之长女李星华的卧室；东耳房为炎华、光华、钟华卧室。另有东、西厢房各三间，东厢房北屋一间为李大钊之长子李葆华的卧室；其他二间为客房，用于安顿来往的亲戚、朋友及学生。当年，于树德、瞿秋白、刘仁静、邓中夏、赵世炎、高君宇、陈乔年、张太雷、罗章龙、秦德君、王一知、邓培等许多青年朋友都在此暂住过。西厢房为李大钊的书房和会议室。他在家中接待过许多知名文人、青年学生和外国友人。建党以后，李大钊负责北方的党务工作，领导了北方地区的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北方地区斗争的运筹和一些革命问题的商讨也是在他家中进行的。

这套院落是李大钊在京城所租用的几处住所中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套住宅，称为：李大钊“北京故



李大钊故居外景

居”。

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

1920年3月，李大钊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周恩来等人的倡导下，1920年8月16日上午，天津“觉悟社”和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以及“青年工读互助团”“人道社”“曙光社”5个团体的23位代表在陶然亭慈悲庵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各团体“改造”“联合”问题，史称：“陶然亭五团体会议”。会后，形成两份文件，即《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

8月19日，“少年中国学会”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会议。李大钊在会上提出，各进步团体都要明确宗旨，对内对外均应标明主义，“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引自《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三期）《改造联合宣言》中亦写道：“我们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要“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这里所强调的“主义”、“旗帜”，不是各种学术思潮与流派，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旗帜。

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成立，成员有3人，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不久，刘仁静、罗章龙、邓中夏、缪伯英、高君宇等人相继加入。11月，小组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思想和组织问题，并决定将这个小组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党的“一大”召开前夕，该支部的成员已有12人，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光辉岁月令人缅怀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中央特别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李大钊参加并发表赞同国共合作的主张，为以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基础。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特邀李大钊参加，并指定其为大会主席团5名成员之一。为了参加国民党“一大”，促成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李大钊毅然南下。

当时，反动政府极力阻挠李大钊南下，未果，便迫害李大钊家人。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唯恐孩子们受到伤害，在亲属的帮助下，紧急搬出石驸马后宅35号，搬到宣武门内铜幌子胡同甲3号暂时居住。

从1924年1月至李大钊去世的3年多时间里，李大钊一家搬了4次家。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李大钊不仅生活处于不稳定状态，而且全家生命受到极大威胁。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政变，镇压革命势力。同时，在北京的奉系军阀也行动起来，迫害共产党人。4月6日，李大钊被捕。28日，被绞杀于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

李大钊在“北京故居”居住期间，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1. 1920年11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进步学生中

组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高君宇任书记，引领青年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2. 李大钊与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潮进行了无情斗争，提出：“联合、团结”“旗帜鲜明”“一致对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张，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

3. 1920年10月，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成立，在李大钊领导下，直接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做了思想和组织准备。“南陈北李”，创建中国共产党李大钊功不可没。

4.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主持北方党务工作，积极开展工人运动，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为推动北方革命形势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5. 李大钊南下广州，帮助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大”，改组国民党，确定“三大政策”，实现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为北伐战争奠定坚实基础。

李大钊在“北京故居”生活的4年是李大钊生活处于相对稳定时期，也是他革命生涯中最为重要的时期，李大钊工作繁忙，功绩卓著，居功至伟，彪炳千秋。

解放以后，为了缅怀这位伟人，文华胡同24号院定为李大钊故居。1979年8月21日，故居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市和西城区政府高度重视李大钊故居的保护工作。2006年2月，投入专项资金，恢复故居原貌。2007年4月28日，正值李大钊同志英勇就义80周年之际，李大钊故居正式向社会公众开放。

松坡图书馆——梁蔡师生情谊的见证

□ 袁泉 梁思萃

北海公园快雪堂，是乾隆皇帝获得《快雪时晴帖》碑刻后修建的。上世纪20年代初，这里是松坡图书馆。它的建立承载了梁启超与蔡锷深厚的师生情谊，更见证了一段笔杆子与枪杆子共同倒袁的悲壮历史。

辛亥革命杰出领导人之一蔡锷

蔡锷（字松坡）年少聪颖，13岁即考中秀才；15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成为维新派风云人物梁启超的得意门生。1899年，蔡锷追随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的梁启超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老师帮助下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立志从军习武，走军事救国之路。

1904年10月蔡锷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训练新军，开办陆军学堂。据当时云南讲武堂学生、新中国开国元勋朱德元帅回忆：“蔡锷每晚办公到深夜，我有时去看他，他的办公室里四周堆满了中文和日文书籍，有些书我可以借去看。他还订有大量报纸，有些是共和派的秘密报纸。这些报大声疾呼，猛烈攻击各式各样的帝制派，主张武力推翻清廷。他虽准许我在他的办公室里阅读这些报纸，却从不表露自己的意见。他同其他教官不同，在任何讲义中从不注入革命思想。他白天像个驱策苦干的人，使自己和学员忙碌不堪，其他时间便过着与人隔绝的生活。”

1911年10月30日云南起义前夕，蔡锷坐上最高指挥官席位，朱德吃了一惊。蔡锷宣布他已被同盟会推举为起义总指挥，其后的战斗证明他不愧为辛亥革命杰出的领导人之一。

蔡梁联手，共同倒袁

1913年11月，蔡锷辞去云南都督一职奉调入京，与已经回国从政的老师梁启超一起，想引导和扶助袁世凯建设民主宪政。

1915年初，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宴请梁启超，

隐露变更国体、复辟帝制的企图，求梁赞同。语既格格不入，梁知祸之将至，遂辞职移家至天津意租界。同年8月14日，旨在恢复帝制的筹安会成立。次日蔡锷来到天津，与梁同到汤觉顿家商议了一夜，决定拼死也要抵抗帝制、挽救民国，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梁即草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袁世凯得知后托人以20万元贿梁请勿发表，遭婉拒后，梁家即被侦探日夜包围。

蔡锷回京后则出入八大胡同玩乐，伪装成赞同帝制的样子，麻痹袁世凯。在袁世凯监控稍疏时，蔡锷秘密乘船赴日，经台湾、香港、越南回到云南。临行前，梁蔡师徒共同约定：“成不在朝，败不亡命”，誓与民国共存亡。

1915年12月25日护国起义前，已是滇军得力干将的朱德见到蔡锷时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只见蔡瘦得不成人形，面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个眼睛还闪闪发光。朱德说：“当他向我走来时，我低头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他虽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蔡锷将起义计划报告完毕，朱德对他说：“你不能带队去啊，你有病要送命的！”蔡看了看朱德以后把眼光移到别处说：“别无办法，反正我的日子也不多了，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蔡锷的坚强意志和献身精神深深影响了朱德，他称蔡锷是自己在黑暗时代的指路明灯。

蔡锷以一省之力搏一国之力，粮饷弹药奇缺，人数也不满万人，在四川与数倍于己的袁军展开了艰苦的拉锯战。他带病出征，近四个月平均每天睡不到三个小时。有一次勘察前沿阵地时遭遇敌军扫射，差点死在田埂上。为了鼓舞士气，已被喉病折磨到几乎失音的蔡锷，亲自跑遍基层部队做动员，用自己的人格力量支撑着部队。后来护国军几乎连半饱都不能了，但没有一个人退却，多次以少胜多，打击了袁军的嚣张气焰。而

除贵州于1916年1月27日宣布独立外，其他西南各省暂持观望态度。护国军处境危急，蔡锷曾数度急电向梁启超求援。

1915年12月16日梁启超秘赴上海。临走前一小时和李夫人告别，夫人说：“上自高堂，下逮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但为国死，毋反顾也。”以前梁出门时夫人从不送别，这回是凌晨三点钟，却送到大门口，很像是可能后会无期的感觉。

梁启超一到上海就有人跟踪，他于是在英租界租了一所房子，于夫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女陪伴掩护。本不想让英捕房知晓，但情况危急，不得不花钱雇两名巡捕日夜轮流看门。1916年3月4日，梁偷渡到香港，不敢上岸，从海上转乘运煤船到越南海防。上岸后躲在潮湿闷热的大山里，染上当地的一种热病，四周无人，灯火尽熄，茶水俱绝。次晨来人急以一种草药施治，如拖延治疗就有生命危险。十日后已宣布独立的广西都督陆荣廷派汽车来接，4月4日到达南宁。

4月6日广东龙济光宣布独立，梁启超与陆荣廷启身赴粤。途中得知4月12日发生“海珠惨案”，与梁情同骨肉的挚友汤觉顿等三人先遣队被枪杀。形势危急的情况下，梁决定独自深入虎穴进行劝说。他的弟子及朋友大惊失色，有几个人竟跪下来拦他。但形势危在旦夕，为了国家和朋友，梁启超毅然前往广州，先劝服龙济光，后参加龙举办的“个个拖枪带剑如狼似虎几十人”的欢迎会。开会不久就有人骂护国军，并鼓起双眼盯着他，像是就要动手的样子。这时梁启超站起来，用更响亮的声音说：“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本来并不打算带命回去。”他痛陈利害，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把桌上的玻璃杯都打得丁当作响。最后满座折服，决定与护国军合作。之后，浙江、陕西、四川和湖南相继独立，直至6月6日袁世凯病故，反袁护国战争取得胜利。

见证梁蔡生死情谊的松坡图书馆

残酷的战争摧毁了蔡锷的健康，他患的喉结核病日益严重，最后已无法说话。1916年9月初赴日本治病，11月8日病逝，年仅34岁。噩耗传来，举国悲恸。国民政府派军舰将蔡锷遗体运送回国，并举行了国葬。在上海的公祭大会上致悼

词时，梁启超泣不成声。之后，他向17位督军和省长致电，发起创办松坡图书馆，以纪念蔡锷，获各省响应，并公推他为筹办主任。1922年梁上书总统黎元洪，获准将北海公园快雪堂及石虎胡同7号官房设为馆址。遂决定以快雪堂为第一馆，专藏本国图书；石虎胡同7号为第二馆，专藏外文图书。快雪堂前二进作为书库和阅览室：后一进为蔡公祠，室内供奉着蔡锷、汤觉顿等护国英烈的遗像和牌位，玻璃橱内陈列着蔡锷的军服、军刀、望远镜等遗物。

第一馆于1923年成立，1925年10月开馆。第二馆于1923年6月1日开馆，第一个月即接待读者456人。诗人徐志摩曾任第二馆英文秘书，并在该馆创立新月诗社，与胡适创办了著名的文学期刊《新月》。1924年4月还陪同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第一馆。1945年秋，台儿庄战役抗日名将、时任北平行营主任的李宗仁将军来第一馆蔡公祠拜谒。他在广西陆军小学读书时是蔡锷的学生，十分景仰蔡锷，赞誉蔡从马后跃上马背的英姿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

松坡图书馆创建后，梁启超一直致力于募集资金。他每周有三天住在松坡图书馆，白天做学问，晚上写字卖钱，八块大洋一个字，以此为图书馆筹款。他的一位助教说：梁先生“每日为松坡图书馆鬻书捐助基金，挥毫不辍，其病纯由于劳累过度所致。当时名医肖龙友为之诊治，曾谓余曰：‘梁先生不能静养，执笔不断，如能百日不看书，余定保其痊愈也’。”然而，为了维持松坡图书馆的正常运转，梁启超一天也没有休息，直到病倒住院。

1929年初梁启超病故。由于经费不足，松坡图书馆两馆合并；1949年5月又与北平图书馆合并，继续开放了几年之后关闭。1987年交还给北海公园，蔡锷的遗物也移交到国家博物馆收藏和展出。

梁启超和蔡锷二位先贤不顾个人安危，奋身投入护国战役，最终阻止了袁世凯复辟帝制，这是复兴中华历史进程中无比光辉的一页。松坡图书馆凝聚着梁蔡二人爱国爱民的革命情怀和生死情谊，值得后人继承下去。而快雪堂作为松坡图书馆也将向社会开放，就是对梁蔡护国精神的最好纪念。